

2014 No4

滿鐵研究

MianTie YanJiu



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滿鐵資料研究分會

目錄

Contents

- 01 皮之不存 毛將焉附（卷首語） 許 勇

論壇

- 02 “七·七”事變前后的滿鐵華北經濟調查
解學詩
- 13 滿鐵殖民主治政策的确立、實施及影響
沈 燕

文摘

- 23 日本關東都督府的東北調查 王鐵軍
- 34 滿鐵與撫順早期殖民主化城市 金 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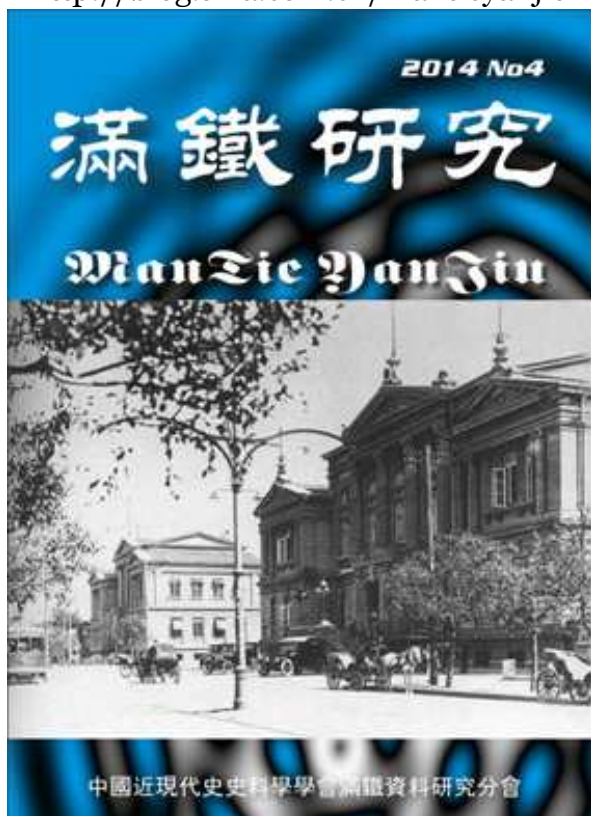
圖庫

- 37 大連老建築漫話系列（一）—— 團結街、
勝利橋 許 勇

譯林

- 41 日本滿鐵會消息二則 許 勇
- 42 滿鐵の夢 山田泉

<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



滿鐵研究

MAN TIE YAN JIU

《滿鐵研究》編委會

主任：張星臣 魏海生

顧問：國 林 葛劍雄 張本義

沈友益 李海績 李東翔

編委：張星臣 魏海生 韓寶明

鄭 蘭 劉建設 許 勇

主管：滿鐵資料研究分會

主辦：北京交通大學圖書館

主編：韓寶明

編輯：《滿鐵研究》編輯部

郵箱：mantieyanjiu@163.com

地址：北京交大圖書館 611 室

郵編：100044

期次：2014 No4（總第 24 期）

日期：2014 年 12 月 28 日

網址：lib.njtu.edu.cn/mt/mtyj.html

版權聲明

《滿鐵研究》刊載之文字和圖片，其版權歸作者所有。凡轉載、摘編本刊內容，請註明“轉摘自《滿鐵研究》”，並按規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則本刊將追究違反規定者的法律責任。

徵文啓事

《滿鐵研究》是一份由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滿鐵資料研究分會主管，北京交通大學圖書館主辦的史學季刊。傳遞信息、交流學術，揭示歷史，暢想未來是《滿鐵研究》的辦刊理念和既定目標。本刊設簡訊、動態、特稿、書評、史證、文摘、論壇、圖庫、譯林、雜俎等欄目。歡迎海內外滿鐵研究領域的專家和愛好者為本刊賜稿。

執行主編：許勇

滿鐵研究

2014.12.28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本期的「“七.七”事变前后的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是解学诗教授的一篇旧作，作为满铁史专家，谢老一直致力于若干课题的思考和研究，其中就包括满铁各个时期的调查活动和调查机构。搞情报，做调查是倭人的本性，更是满铁的本钱。即便到了风光不再的晚期，满铁经营的三大重点，依然是铁路、煤矿和调查。谢老的该类研究成果后来升华成一部专著，即《隔世遗思——评满铁调查部》（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满铁殖民统治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影响」的作者沈燕，是伪满皇宫博物院的研究馆员。该文对满铁殖民统治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作为日本的国策机关，满铁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了 40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制造“满洲国”，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都仰仗满铁在经济和情报上的保驾护航。正如作者所说：满铁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执行者和实施者。

「日本关东都督府的东北调查」从标题看似与满铁有些距离，其实不然。关东都督府是上世纪初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的三大机构之一，另两个是总领事馆和满铁。设立伊始，关东都督府的成员大多来自日本的台湾总督府，而时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后来又分别出任满铁的设立委员长和首任总裁。如此这般，关东都督府的东北调查，自然也就和满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

「满铁与抚顺早期殖民化城市」是抚顺市博物馆金辉的一篇短文，主要介绍抚顺这座煤矿之城早期的发展史以及它与满铁的关系。日俄战争中，日军趁机进驻千金寨，霸占了中资煤矿，成立“抚顺采炭所”。1907 年，满铁染指抚顺煤矿，设立“满铁抚顺炭坑”。从此，侵略者实施了一系列诸如移民、开矿、采煤、筑路、盖房等蚕食和扩张行动。抚顺逐渐成了日本人的聚宝盆和安乐窝。抚顺煤矿是满铁营业收入中仅次于铁路的第二大财源，截止到 1945 年东北光复，满铁在抚顺开采掠夺的煤炭总量达 2 亿吨，获利 20 多亿日元。诚如作者所说：“抚顺早期殖民化城市的兴起，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和侵略历史的缩影，是令抚顺人民没齿难忘的一段噩梦般的经历。”

「大连老建筑漫话系列（一）——团结街、胜利桥」是讲一条街和一座桥的故事。研究满铁就应该了解大连，这是毋庸置疑的。团结街、胜利桥之所以出名，大连的发轫标志是其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它们与一串历史事件和人物紧紧地联系着。而其中不少又与满铁相关，如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中村是公、满铁总裁官邸等等。

「日本满铁会消息二则」译自该会网站，满铁会始建于 1946 年 2 月，起初是满铁社员的新生会，1954 年 7 月，满铁会升格为财团法人。如果按照满铁会信息中心将于 2016 年 3 月解散计算，满铁会存续了整整 70 年。满铁会的机构不大，会员不多，但它做到的事不少，尤其是宣传和出版方面，每年三期的《满铁会报》便是例证。满铁会的藏书也是难得的文献资源，其即将公布的目录应是满铁研究者众所关注的。

「满铁の梦」译成中文就是“满铁之梦”，做梦的是一位 85 岁的日本老人，既然是梦，就有点杂乱无章，还有点文不对题，只有那位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曾在满铁调查部任职的平三伯父还与满铁沾点儿边。“梦”中讲述的一些事情，今天看来颇感诡谲。之所以选刊此文，唯一的目的是为懂日语的读者提供学习资料。

“满铁”存续了 40 年早已解体，“满铁会”维持了近 70 年行将解散。此情此景，不由得想起一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七七”事变前后的满铁华北经济调查

解学诗*

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作为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国策会社”，在其存在的近 40 年间，从各方面参与了日本对华侵略，“一贯是大陆政策的中心”（注：原朗：《经济调查会立案调查书目录》解题。《经济调查会立案调查书目录》第 1 卷，本之友社，1996 年，第 1 页。）。因而，满铁研究应是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在满铁研究中，关于满铁调查部的研究，在日本虽已有相当可观的成果，中国却属于空白。本文主要就“七七”事变前后，即 1935 年至 1939 年初的满铁华北经济调查，大致试做些分析，以期揭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满铁在日本经济侵华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本文并未涉及 1936、1937 年满铁的两次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及其以后的满铁华北事务局调查室（后改调查部）的其他华北农村调查。

一 满铁调查活动重点之转移华北

满铁设立伊始即按首任总裁后藤新平的意旨设立了调查部，不久又改为调查课（注：1907 年 4 月，满铁设调查部，1908 年 12 月改称调查课，此后至 1931 年该课先后隶属于满铁总务部、社长室、庶务部等。人员最多时逾百人。）。满铁调查活动的地区，以中国东北为中心，遍及各地，但在调查课时期，即“九一八”事变前，“以满洲及蒙古为主，以与满蒙有重要关系的中国本部、西伯利亚及欧俄为辅。”调查内容，则“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交通、文化等一切方面”（注：《满铁第三次十年史》，第 2368 页。）。当时，华北和东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在满铁调查中虽处于“为辅”的地位，但自 1927 年后，满铁调查课内始终有两个系的业务，涉及华北和“中国本部”（注：1927 年以后调查课的贸易统计系编辑《华北贸易年报》；交通系从事“中国本部铁路”调查。）。而且在此之前，1918 年经川上理事建议和日本驻华公使支持，满铁还设立了北京公所（注：1916 年前后，满铁川上俊彦理事为谋取鞍山铁矿和吉长、四郑等铁路权益等逗留北京。满铁公所主要进行交涉工作，同时也从事调查、情报活动。“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奉天、北平、郑家屯、吉林、齐齐哈尔、洮南等地设有 6 个公所。），该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现地调查机关。公所设有研究室，“担当调查与出版事宜”，时而又派出“出張员”或“驻在员”在外活动，1928 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时，该室南迁并入上海事务所（注：《满铁第三次十年史》，第 2552~2553 页。），其矛头所向，不言而喻。

1933 年 5 月塘沽协定的签定，是满铁华北经济调查积极化的转机。此前满铁对华北是随时进行现地调查，“但昭和 8 年(1933)5 月该地区的形势已不容许这种消极方针。该社（指满铁）首先为进行现地基础调查和担当情报连络，在天津、青岛常设驻在员。”（注：满铁产业部：《经济调查会立案调查书目录》，第 1 卷《立案调查与文献目录》，昭和 12 月 9 日，第 9 页。）满铁自身把这些派出机关说成是“华北工作的触觉”（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6 年，第 225 页。）。而所谓“华北工作”，如所周知，就是将冀东 22 县沦为日伪控制的所谓“非武装区”，和以此为基地进而打击抗日军，迫使国民政府妥协，禁止抗日运动，建立亲日政权。特别是 1933 年 9 月庐山会议后，到 1934 年伪满与华北实现通车、通

* 解学诗（1928~），辽宁开原人，满铁史专家，1953 年吉大研究生毕业，现为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

邮和伪满在长城各口设卡时，满铁积极策划设立新的华北调查机构——满铁经济调查会华北经济工作调查班及其所属的天津、青岛和上海三个支所（注：满铁调查部：《支那经济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支那·立案调查书类，第二编第 1 卷其二，（以下简称“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 315～350 页。）。计划虽未实现，但从 1934 年初起，满铁对华北“进行了有组织的调查”（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5 年，第 216～217 页。）。1934 年 5 月，满铁为了进行华北各种资源、交通、一般经济、利权等项调查和对策起草工作，在天津、青岛、太原等地设立了驻在员（注：1933～1934 年，满铁在华北设驻在员的说法不一。据“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 352 页载，为此三地。各地驻在员都有事务所，人员多寡不同。）。1934 年，满铁提出的有关华北的“调查立案报告书”共 9 类 37 项；同年 10 至 11 月满铁还派人参加了中国驻屯军实施的华北资源调查（注：“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 355～360 页。）。

满铁向华北伸张势力，固然与其在“满洲”的地位变化有关，但主要还是其“国策”性质使然。由于伪满洲国业已成立，满铁历来所承担的“在满洲进行政治活动的任务”已告完成，但在日本经济势力积极向中国内地伸张方面，满铁又担负起“更大的使命”（注：1935 年 5 月林陆军大臣同满铁新任总裁松冈会谈的基本内容（一）。《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一），みすず书房，第 785～786 页。）。1934 年 3 月和 6 月，满铁理事十河信二以满铁经调会委员长的身份，衔着所谓“重大使命”，两次跑到中国内地，广泛接触中国各界要人，进行所谓“对华经济工作”的考察。正是根据他的建议，在华北事变达到高潮的 1935 年，满铁决定全额出资设立兴中公司，“作为对华经济工作的统一机关”，十河本人后来也成了兴中公司的社长。与此同时，满铁对华调查机关——满铁经调会大规模地开始华北经济调查和对华经济政策的起草活动。

满铁经调会即满铁经济调查会的简称。它是 1931 年末日军侵入锦州后，在炮制建立伪满洲国的过程中，由关东军提出要求设立的调查机关；它“应关东军咨询，协助军方进行有关满蒙各种情况的调查，研究起草建设方策和计划”（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5 年，第 213～215 页。）；它“在形式上虽然是满铁的机关，实际上由于军方的特殊要求已成为军司令官编制下的军方机关”（注：满铁档案：甲种、总体，监察，监察，监察报告，第 1 册之 1。）。

华北事变的急剧升级，是从 1935 年 1 月关东军制造的迫使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撤离的察东事件开始的。此后于 2 月 26 日，满铁同时设立两个“对华经济工作机构”——总务部东亚课和经调会第六部。满铁在阐述东亚课设立理由时称：“作为大陆经济工作机关的满铁已达到了这样的时期：为完成其使命，在目标上必须将重点从对满经济政策转向对华经济政策。”东亚课是满铁“对华北经济工作”的“联络统制机关”。而“联络”包括“社内联络和同社外的交涉以及事业的企业化”（注：《满铁第三次十年史》，第 2429～2430 页。）。所以，它是满铁向中国内地伸张势力的中枢，当时满铁设在北平和上海的事务所以及各地驻在员事务所均由其统辖（注：1935 年北京和上海事务所在天津、济南、青岛、广东、南京、厦门、汉口均派有驻在员，其中如天津、济南、青岛驻在员事务所均有相当规模。）。

与东亚课不同，经调会第六部是“对华经济政策的调查策划机关”（注：《满铁会社功绩概要》（第三次），第 244～245 页。）。当时的满铁经调会，在委员长（注：1934 年 7 月 10 日以后由河本大作理事任经调会委员长。）之下由部和班构成，1935 年总人员达 330 人（注：满铁：《昭和 10 年度统计年报》，第 968～

969 页。)。其第一部负担经济一般调查，第二至第五部分别承担农矿、交通、商业金融、法政劳动调查。新设立的由野中时雄任主查的第六部，则是“以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地区为对象的”（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5 年，第 265~266 页。）。它设有两个班——综合班和基础调查班。综合班并非是综合本部的调查，而是“综合经调会其他部和班的调查起草业务”，这就是说，经调会的各部、班，都被要求把越来越大的比重放在“对华关系上”。与此同时，满铁还成立了网罗经调会和社内各部门“权威人士”的 6 个“对华经济政策对策小委员会”。

值得注意的是华北港湾调查小委员会，它在调查时竟动用了日本海军。该委员会成立于 1935 年 6 月，经调会 4 人，计划部 3 人。第一步从技术方面对天津、塘沽、大沽进行“现状调查”，实际上就是通过天津驻在员搜集“各项资料”。7 月 29 日晚起，乘由葫芦岛起航的日本海军第 15 驱逐队的秋号，进行为期一周的渤海湾内的港湾调查（注：满铁调查部：《中国海运港湾关系立案计划及调查资料》，第 180、181~182、186 页。）。当时，港湾是满铁华北经济调查的要害所在。满铁经调会第六部主查野中时雄以《华北经济调查的根本目标》为题称：“华北产业开发的中心目标是山西省的煤炭”，“作为经济调查的对象首先指向这个资源”，“假定可供输出的山西煤产量约为 1000 万吨，继之而来的是输出港定在何处的课题。”当时，日方认为，白河流域的天津、塘沽等港均无任何前途，青岛距离偏远，所以设想改筑秦皇岛、新筑大清河口以北的北方大港等，但“均嫌不够理想”，可是只有“输出港决定后”才能考虑由山西到港口的运煤铁路问题，亦即：是铺设沧石（沧州至石家庄）铁路，还是延长胶济铁路（注：“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 368~374 页。）。对此港湾调查恐怕难以很快得出结论。但在铁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1936 年夏中日关系突告紧张时，中国驻屯军决定将沧石铁路计划改为修筑津石铁路，并向宋哲元提起交涉（注：解学诗：《兴中公司与“七七”事变》。《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第 3 期，第 204~211 页。）。

经调会第六部基础调查班，分为农牧、工矿、金融、财政、政治、外交等 5 个部门，共有调查员等 26 人（注：满铁档案：总体、东亚、人事、杂件，昭和 10~12 年度，第 20 册。）。他们的“基础调查”服务于日本“对华经济工作基本方针”的确定。当时，该班曾制定涉及 6 个方面的 40 多个项目，诸如：中国经济年度报告，中国经济机构调查，山东河北农业资源调查和利用方法研究，在华外资工业和当地工业关系，中国国内市场和东北特产在中国市场，中国租税，中国政治，等等。但经调会第六部成立后不久，即为“天津、察哈尔的实际工作”，而“奔忙于紧急临时任务”（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5 年，第 265~266 页。）。

1935 年的春夏以至秋冬，日本军部在华北接连制造事件，将本已十分紧张的华北局势推到无以复加的尖锐程度。满铁不仅派人“奔忙于”华北事变的制造，而且在“何梅协定”签定时和 11 月 3 日中国宣布币制改革后的两次军事威胁与讹诈中，直接扮演了帮凶的角色（注：1935 年 6 月 12 日，满铁从洮南、长春等地将 7 个列车 168 节车厢的关东军军事列车开到山海关；11 月 12 日，关东军又向山海关集结了由 230 辆车编成的 10 个列车，12 月 20~30 日才撤退。）。及至同年 11 月 25 日和 12 月 18 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先后成立时，满铁更采取了针对华北的两大举措：一是 8 月 2 日经日本政府批准的兴中公司，于 12 月 20 日，即冀察政务委员会面世第 3 天后，赶忙正式开张营业。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企图抓住冀察政权这个对手，攫取利权，与之结成“依赖关系”，使之“亲日化”，从经济上推行“华北自治”阴谋；二是同年 11 月 22 日撤销经调

会第六部，设立天津事务所，这非但是满铁华北经济调查的强化，而且是进一步的调查现地化。满铁经调会第六部撤销后，其基本业务——基本调查班的业务全部为经调会第一部东亚经济班所继承，当时该班“几乎全部调查研究都是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但它“不是以对华政策面临的个别问题为对象的”，“而是调查研究中国经济全般基础结构”，并对各个产业部门进行所谓“基本调查研究”（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5年，第225~226页。其调查项目有：中国经济社会基础结构；中国农村经济一般特点；中国工矿业形成过程；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历史形成过程；现阶段中国社会形势，等。）。至于天津事务所，它虽然集“对外联系”、“调查”和“特别受命事项”于一身，但“由于满铁在中国的配合国策方针，在目前情况下以调查为其主要任务，因而天津事务所这种组织，从广义上来看，也可以称作调查机关。”（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6年，第221页。）天津事务所直属于满铁总裁，设有庶务课和调查课（注：发行“天调资料”和“北支经济资料”系列调查资料集，反映了广泛的调查活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天津事务所设立伊始，即受命统辖北平事务所（1932年由北平公所改组而成），并扩大华北驻在员网。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除天津、北平的事务所外，在青岛、济南、郑州、太原、大同、绥远、张北、多伦、张家口等地设有9个驻在员事务所（注：满铁档案：甲种，经济、庶务、庶务、情报，第20册。）。它们都负有“调查”和“情报搜集与通报”使命，是侦察和刺探中国各方面情况的据点。此外，天津事务所还向各特务机关派遣“经济财政顾问”，向太原、张家口、绥远等地派遣各种专家。总之，“天津事务所采取了协助有关华北的国策”，“各地驻在员、派遣员也都互相一致地协助特务机关或领事馆的政治经济工作。”（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6年，第225页。）

二 服务于军部备战的满铁华北经济调查班

在华北事变高潮中设立的天津事务所，规模急剧扩大，1935年至1936年从76人增加到181人（注：《满铁统计年报》，昭和10年度，第974~975页；昭和11年度，第966~967页。），成为配合军部执行所谓“特殊使命”的满铁在华北的中枢。满铁之所以将华北中枢设在天津，是因为天津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其兵力虽远不能与关东军相比，但在关东军的支持、参与下，成为制造华北事变、分割和吞蚀华北的中心。

满铁由于其“国策会社”性质所决定，也有其自身的华北扩张目的。军部在华北制造的形势，也可以说给满铁的“华北进出”提供了机遇。而且，满铁认为，在中国政府尚且拥有主权和中国人民抗拒日本侵华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采取诉诸武力的高压政策是一切工作的前提”（注：满铁经调会田所耕耘：《北支の対日态度（现状の真相と将来の趋势）竝之が对策に関する意见》。“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50~51页。），至少军部对于满铁的“直接的经济工作”在“背后竭力援助”（注：满铁经调会押川一郎：《北支经济进出/意义下方策（私见）》，极秘，打印件。）。所以，不能把包括经济调查在内的满铁在华北的活动都看成是被动的。但是，随着形势的演化和发展，满铁与军部的共同活动，军部日趋占据上风。

中国驻屯军也拥有调查班（注：中国驻屯军调查班的调查资料，以“天调”为代号进行编印。），但其调查活动往往要求满铁参加，且对调查活动进行所谓“指导”。在满铁开始强化华北经济调查的1934年秋天，中国驻屯军曾派出6个班，并有满铁人员参加，对察哈尔、平绥、平汉、津浦铁路沿线，山东西部和南部，进行了地理、一般资源、畜产、矿产等调查，还兼而进行了带有明显备战性质的

所谓“衣粮资源”调查。与此同时，中国驻屯军还向满铁发出《华北重要资源、经济的调查方针及要点》的指示（注：“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 384～390 页。）。当时，由于“塘沽协定”和冀东的所谓“非武装区”的设定，中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日益高涨。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驻屯军要求满铁作为“特别需要调查事项”，调查研究“为扶植对华特权，打击中国的排外、维护主权和回收特权等各项运动的办法”；与此同时，调查华北的煤矿、铁路、港湾，特别是平绥铁路和龙烟铁矿。中国驻屯军的要求中明确提出建立所谓“日满华北经济圈”，和补充日本“战时国防资源之不足”、“加强帝国在华北经济势力”等方针和口号。应该指出，当时主要还是要求对华北经济进行“基础调查”，用以“研究具体方策”。

1935 年，日本军部导演的华北事变发生了戏剧性的急剧变化，相应地，中国驻屯军和满铁的华北经济调查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军部的军事调查增多；二是军部从“指导”满铁调查转到直接部署和统制调查；三是满铁“基础调查”的主导地位让位给“紧急实施项目”的调查。

1935 年 5 至 7 月和 9 至 10 月，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分别进行了察哈尔和绥远的所谓资源调查。对于关东军的察哈尔调查，满铁派 18 人参加，分成第一、第二和张家口班；对于中国驻屯军的绥远调查，满铁派 15 人参加（注：《经济调查会立案调查书目录》，第一卷，第 11 页。）。日本北京公使馆向外务大臣报告这一调查情况时，说他们以调查军用地志名义进行经济调查，并称“事属军方机密，务请不要向外泄露”（注：1935 年 11 月 16 日若杉参事官致广田外务大臣第 245 号函。）。其实，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这两项调查，都是经济资源调查与军事调查相结合，军用地志调查并非名义。

就在进行上述调查的同时，中国驻屯军统辖的大规模华北调查班应运而生。“何梅协定”后的 1935 年 7 月，中国驻屯军为了“对紧急进行开发的必要事项进行调查立案”，在军司令官“指挥统制下”，开始组织“关东军有关者、满洲国有关者、满铁调查机关及在天津各调查机关组成的经济调查班”。8 月 20 日关东军照会满铁，要求满铁经调会派一名干事常驻天津，并派出所需人员到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报到。照会所附《华北经济调查班编成纲领》（注：该“纲领”早在 8 月中旬即已下达给满铁经调会。随之下发的还有《伴随华北新政权的发生经济开发指导方案》。）规定：“华北经济调查应获得华北各省（主要是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察绥）可能成为经济开发及中日经济要素的基础资料”；“华北经济调查以秘密进行为旨”；“作成报告书向中国派遣军调查班提出”，并“交华北经济开发指导协议会审议事业可否实行和投资的选定者。”

当时，伪满洲国派到中国驻屯军的人员组成的调查班，称甲嘱托班。其主要调查对象是：通货及金融（第一班）、财政及贸易（第二班）、政治及外交（第三班）、产业（第四班）、交通（第五班）。令人注意的是：金融和财政都有所谓“自治制度”和“行政机关整顿与调整方案”的调查起草（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甲嘱托班的组织及调查要纲》，1935 年 9 月 6 日。）。最后提出《华北通货金融措施要纲》和《华北新财政政策》等（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乙嘱托班调查概要》，北支产业调查书类，第一编，第一卷，（以下简称“乙嘱托班概要”）第 414 页。）。

乙、丙两个嘱托班由满铁派遣人员所组成。丙嘱托班又可以说是乙嘱托班的前奏。1935 年 8 月 1 日，该班应中国驻屯军的要求而组成，由满铁经调会第六部野中时雄主查率领，共 5 人。他们是在“华北由华中独立的场合”为前提进行调查的，内容包括金融、经济、税制和贸易。同年 11 月 14 日该班向中国驻屯军

提出《华北独立场合的金融对策》(南乡龙音)、《利用华北形势剧变日本应如何进入华北金融、经济界》(前岛正道)、《天津的金票统制》(和田喜一郎)、《日满华经济依赖关系调查》(中楯寿郎)、《华北财政关系报告书》(太平正美)等(注:“乙嘱托班概要”,第 402~406 页。)

阵容庞大的乙嘱托班,是此次中国驻屯军华北经济调查的主力 and 重点。1935 年 8 月 1 日满铁经调会野中天津常驻干事到达天津后,押川干事又奉派到天津与中国驻屯军进行协商,结果决定 10 月 1 日于天津日租界荣街 17 番地 1 号设立乙嘱托班事务所。根据中国驻屯军决定的《乙嘱托班调查纲领》,该班担任“适应眼下形势需要急施事项的调查”,并将“重点置于皇国国防上紧急开发所必需的资源,和扩充强化经济势力的必要的主要经济部门的开发计划,优先各国获得重要利权,尽快制定具体方案,提出献策。”(注:“乙嘱托班概要”,第 13~14 页。)由此可见,伪满洲国的甲嘱托班侧重于政治方面的“调查立案”;而满铁的乙嘱托班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调查立案”。根据 1935 年 11 月 13 日满铁理事会议决定:乙嘱托班第一次即 1935 年编队,分总务、矿山、工业、铁道、港湾、经济等 6 个班,共 115 人;第二次即 1936 年编队,分总务、矿山、铁道、港湾等 4 个班,人员却增至 175 人。调查地区因班而异,主要是察哈尔、河北、绥远、山西、山东、河南;矿山班计划,如有可能将对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进行调查。

在拥有主权的中国领土上,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查活动,无疑是侵犯主权的间谍行为。正是因为如此,调查班的活动完全作为军事行动来执行。满铁调查员全部被任命为军嘱托;调查用品完全当作军用品进行运输;文件资料通过军邮寄送;事务所架设军用电话并使用特别密码。满铁经调会的《华北调查派遣员须知》写道:“华北调查是基于中国驻屯军的要求,以经济调查会为主体,由满铁各机关合作,极秘密实行的国策性国防重要调查,因而不仅要按军规行事,而且要遵守满铁社员规则。”(注:“乙嘱托班概要”,第 103 页。)所以满铁调查员在进行活动时,被严禁暴露“军嘱托”和“满铁社员”的身份。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逃避中国的耳目。

乙嘱托班长由野中时雄担任,他同时兼任经调会驻津干事和刚刚成立的天津事务所调查课长。关于业务联系当时作了特别规定:天津事务所长就有关业务与满铁各部所长联系时,必须经过满铁总务部东亚课;经调会与天津驻勤干事联络,必须经过总务部东亚课和天津事务所;而天津驻勤干事就现地业务在社内方面受天津事务所长指挥,故与经调会联络必须通过天津事务所长。总之,与中国驻屯军对应的满铁天津事务所,成为乙嘱托班的活动中枢。而中国驻屯军仍力求强化对满铁调查班的控制。1936 年 1 月下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曾表示:“使嘱托班脱离天津事务所,全部纳入军部”,并“在军部内设置优秀的联络员”(注:经济调查会干事:《酒井大佐谈话大要》(1 月 26 日谈),极秘。本件附有字条:“内容关系对中国对策,特请勿向外泄露,阅后烧掉。”)。同年 7 月 20 日,满铁经调会的伊藤武雄和奥村慎次被任命为“军顾问”(注:“乙嘱托班概要”,第 43 页。伊藤武雄当时任经调会驻新京干事,后任满铁总务部参事;奥村慎次当时任经调会第二部主查,后任满铁产业部次长。)

乙嘱托班的组建和开始活动,是在 1935 年 9 月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要求华北五省“自治”,为此而不惜诉诸武力的爆炸性声明之后,或者说“是在华北五省巩固的独立政权出现的预想下着手调查立案的。”(注:《经济班调查概要》。“乙嘱托班概要”,第 146 页。)因此,乙嘱托班被要求迅速就“国防

上需要的资源开发”“作出几种方案”，尤其是对“铁（含铁矿开发上必要的煤炭和其他矿物）和石油的开发倾注全力。”（注：《乙嘱托班调查纲领》。“乙嘱托班概要”，第14页。）而且，在乙嘱托班开始行动后，冀东、冀察两政权也相继面世。但是，在中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特别是“一二·九”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冀察政权并未像日本所期望的那样“亲日化”，亦即“与事先的预计相反，亲日色彩淡薄，作为独立政权根本不稳。”（注：《经济班调查概要》。“乙嘱托班概要”，第146页。）当然也就无从使冀东、冀察“合并”而达到华北五省“自治”的目的（注：1936年1月13日《北支处理要纲》。《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322~323页。）。在这种情况下，乙嘱托班的“调查立案”“中途停止立案，而只单纯进行调查者不少”（注：《经济班调查概要》。“乙嘱托班概要”，第146页。），特别是从1936年下半年起，中国驻屯军已悄然从“华北自治”转向准备武力夺取华北，这在乙嘱托班的活动中亦有反映。

1936年3月初，中国驻屯军即通过关东军要求满铁乙嘱托班的铁道班、矿山班、港湾班继续进行1936年度的调查。及至5月，中国驻屯军又“委托”满铁于该年度进行“特别调查”，即资源、水运、供水、铁路、税制、行政等有关“作战计划”的调查（注：昭和11年5月8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致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天调秘第25号函，《驻天津干事关于昭和11年度特别调查的通知书》。“乙嘱托班概要”，第77~78页。）。“由于乙嘱托班事先了解到军方的上述意图，关于该班即将实施的铁路、资源、水运调查，已由铁道、港湾两班分别纳入昭和11年度调查实施计划内，所以不必特别改编调查计划就可以接受军方的要求。”（注：《驻天津干事关于昭和11年度特别调查的通知书》。“乙嘱托班概要”，第77~78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关系“作战计划”的特别调查，资源和水运方面的调查，主要在包头、宁夏至兰州沿线进行，具体项目包括粮食、马料、燃料、民间车辆、驮兽能力、民船等“可能收集到的数量”；供水和铁路方面的调查，主要在平汉、津浦铁路沿线进行，具体项目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净水法、运水法，铁路线路、车辆、工厂、职工、通信等状况（注：“乙嘱托班概要”，第74~76页。）。联系到1936年4月18日的中国驻屯军的扩编；《昭和11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的推出；5月和8月关东军被授权，可将部队部署在“长城线外近处”，和一旦需要重大军事进攻必须“迅速果断行动”（注：《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406，587~588页。）；特别是同年11月关东军策动伪蒙军西犯绥远等事实，1936年满铁乙嘱托班的特别调查，不啻为地道的军事侦察行动。

历时近两年的满铁华北经济调查班，至1937年3月31日正式结束，共提出调查资料85册，其中总务班1册，经济班14册，工业班4册，铁道班58册，港湾班5册，其他3册（注：编入满铁产业部《经济调查会立案调查书目录》第一卷“立案调查书文献目录”者为74册。）。但是，满铁的华北经济调查并未就此结束，中国驻屯军通过满铁天津事务所继续“委托”满铁进行“必要的调查”。1937年3月8日中国驻屯军提出要求，5月20日满铁同意进行的1937年度华北调查，分为中国驻屯军委托和中国驻屯军参谋部委托两部分。前者主要是经济资源和制度、居民调查，具体项目包括：“从财政经济上看中国特别是华北各政权进行战争能力的有关资料的搜集”；平汉、察绥、山东等地区“国防资源特别是作战用资源调查”；“华北铁路现况调查特别是其管理和利用必要资料的搜集”等（注：“支那开发方策及调查资料”，第400~409页。关于中国驻屯军调查班委托调查项目，1937年2月即通知满铁。其中“国防特别是作战用资源调查”，包

括平津、察绥、山东、平汉、陇海 5 个沿线地区，并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可见中国驻屯军 1937 年委托满铁进行的华北调查，和 1936 年满铁所承担的华北“特别调查”，其性质与目的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是为了备战，武力夺取华北。

三 满铁参与日本对华北占领区的经济决策

“七七”事变后，满铁派 20000 多名社员和 5000 多辆铁路车辆，伙同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华北的 5000 多公里铁路（注：满铁派向华北的铁路人员，1939 年 3 月达最高峰，为 20610 人。满铁当时拥有各种车辆共 22000 余辆，派入华北的车辆最多时为 5707 辆，为满铁车辆总数的 1/4。）。满铁全额出资的在华北子公司——兴中公司，则成了到处占领、管理中国华北工矿企业的别动力量。而专门面对中国驻屯军执行所谓“特殊使命”的天津事务所，一变而为满铁华北事务局，成为满铁全面参加“七七”事变的综合统辖机关，并迅速扩大。原天津事务所调查课，改为事务局的调查班，后改为调查室，1938 年 9 月又成为事务局的 9 部之一的调查部。该部除了从事种种所谓“事变事务”和诸多临时性调查外，主要是伙同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华北占领区的经济政策和计划。当然，军特务部处于主宰地位，满铁则是具体业务担当者，即决策的起草者。

不过，日本对华北经济政策与计划的制定，早在“七七”事变前已经开始，它为事变后的日本对华占领区经济决策奠定了基础。满铁向来是将调查和政策起草结合在一起的，故称之为“调查立案”。

如前所述，满铁经调会随着对中国调查的加强，和伪满洲国长期经济计划的开始制定，于 1935 年 9 月就推出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大纲案》，明确提出“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满华北经济集团”，这个集团“将来扩展到全中国”。作为具体对策，“大纲案”要求首先获取并保有“铁矿、煤炭、锰矿、石灰石、钨矿、萤石、石油”等（注：满铁经济调查会：《北支经济开发方针大纲案》，昭和 10 年 9 月，特秘。封面载有：“在主查会议上修改后确定”。）。这不是定案。1936 年 2 月，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推出了要求“各方面工作悉依此进行的最高指导方针”，即《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领》（注：“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 104~120 页。），它不但是当时满铁经济调查班的活动准则，据以制定夺取利权的计划，而且也是对华北确定的经济政策。与这一“纲领”一起下发的《随着新政权的产生经济开发指导案》还称：“我方在此次交涉中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异常成果（指何梅协定），正顺利地朝着建立新政权的方向前进”，“此时在华应以‘抓大的’观点着手项目。”（注：“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 97~102 页。）所以，上述“纲领”作为方针提出：“对需要的国防资源及其他有必要迅速开发的重要企业……使之仰赖日本方面积极投资”；而所谓日方投资，“纲领”说，主要是“促进财阀巨头崛起”。同时，由于日本已提出“中日经济提携”口号，所以“纲领”要求实施日本人把握企业要冲的“日华合办企业”的原则，和造成“日方全额出资”的局面。至于所谓“国防资源”和“有必要迅速开发的重要企业”，是指“铁、煤炭、石油及其他特别指定者”；对于这些，“纲领”要求必须作为“统制企业”，以达到“国策”目的（注：“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 104~120 页。）。乙嘱托班的调查目的，就是尽快具体选定项目，而兴中公司的设立则是与中国对手谋求实现项目。1936 年 1 月 26 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对满铁调查班宣称：

“作为军方，虽然因人而方针有所不同，但我个人考虑，应尽量避免国际冲突，实行实际的渐进主义”，“所谓实际的，主要意味着经济力的把握，但要靠以军力为背景的威胁，使之提供利权便利”；“所谓渐进的，就是逐步造成南京政府威力所不及的地方，在不引进外国势力的前提下，将中国置于分立状态。”（注：经济

调查会干事：《酒井大佐谈话大要》（1月26日面谈），极秘，打字件。）1936年以后的情况表明，日本的这种从政治和经济上分裂与蚕食华北的政策，并非是成功的。尽管如此，日本在悄然准备武力夺取华北的同时，在经济上仍然按既定方针执意推行下去，而且，它成为日本的一项国策。1936年8月11日，日本有关各省确定的《第二次华北处理要纲》写道：“华北的经济开发，以民间资本的自由进出为宗旨，通过我方权益的伸张，构成以日华人一致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日华不可分的势态，以资达到平战两时保持华北亲日态度的目的，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军需资源（铁、煤、盐等）的开发和与之相关联的交通、电力设施，必要时以我方资本谋求实现。”（注：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940～1945，下，第347～348页。）

1936年10月1日，满铁实行重大机构改组，历经近5年的满铁经调会为产业部所取代。这种改组被称为满铁松冈总裁两项基本主张的体现，即：“适应日满两国策，协助满蒙的经济开发”和“满铁一体化”（注：满铁总裁（松冈）在第一次产业会议上的训谕。《满铁资料汇报》，第1卷，第6号，1936年12月，第1～3页。）。前者实际上即准备“协助”推行当时正在紧锣密鼓编制的伪满产业五年计划；而后者无非是为了前者而作的组织调整。产业部的组成以原经调会为主体，是“产业综合企划机关”，“对在华产业机关也具有统制力”（注：《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6年，第1～2页。产业部设有庶务、商工、农林、矿业、交通、资料、调查役等五课一室一役，和地质、农试、兽研等科研单位。）。与产业部同时设立的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是“为了特殊目的”，它是“根据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及满洲国的委托，为经济调查规划而在会社内部设立的委员会组织，既是责任机关，又是审议机关；它以产业部长为委员长，各部首长任委员，实际上起着军参谋长辅助机关的重要作用。”（注：《满铁第三次十年史》，第2398～2399页。）而满铁产业部作为经调委的成员，负有策划、制定“满蒙”和华北的产业、经济方针、对策和计划的任务。当时——1936年底，满铁对华北的经济调查，由于经调会数年操作和满铁华北经济调查班的调查，被认为已经完成，故与伪满一起步入华北产业计划的起草阶段。

日本为拼凑自己的经济集团，竭力使其统治下的殖民地和占领区在经济上从属于自己。为此计划于1937年秋召开中央经济会议，会上拟“综合研究朝鲜、满洲、华北的产业五年计划”。为了做准备，预定于当年8月上旬召开大陆经济会议。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为此于同年5月18日决定，在满铁产业部内设立大陆经济会议筹备小委员会。小委员会于当年8月终于提出了《华北产业开发计划案》和《华北产业开发计划表》。“计划案”中列为首位的关于矿工业的方针是：“重点置于开发供给日满集团所必需的资源，并设法促进华北重要矿工业的开发，在这些部门中扶植牢固的日本势力，使之有事之际，顺利获得和确保资源。”（注：“支那开发方策与调查资料”，第122页。）问题是，“计划案”提出时“七七”事变业已爆发，“大陆经济会议”未能如期召开，但计划案却给事变后华北经济掠夺计划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后，满铁不仅全面地参与事变，而且极力借事变之机谋求实现掌握华北经济主导权之宿愿（注：1936年3月，满铁经调会就曾提出：《华北经济开发投资机关的形式》文稿，当时兴中公司刚刚设立。文稿认为，由满铁或满铁傍系会社控制华北经济天经地义，反对由中日双方财阀辛迪加组成“中日合办会社”，或以日本财团为实体，根据日本法律成立“株式会社”。）。这就给日本的华北经济决策增加了复杂性。1937年8月，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以关东军顾问身

份提出了《华北善后处理要纲并意见书》，要求“和满洲一样，在华北也应由满铁综合经营以铁路运输为中心的煤矿、炼铁、液体燃料、盐业等重要产业”（注：满铁：《中国事变爆发后日本大陆经营的政治动向》。满经（一）（1），极秘，打印件，1938年8月，（以下简称“事变后日本大陆经营的政治动向”）第51~56页。）。继而，1937年9月，担任华北方面军嘱托的满铁产业部次长奥村慎次与之相呼应，也抛出《华北产业基本对策纲要草案》（注：满铁调查部：《北支那产业开发计划资料》（总括之部）北支那产业开发计划立案调查书类，第一编（以下简称“北支那产业开发计划资料”），第29~30页。），提出在华北“由日本资本参加而兴办的产业，分为统制企业和自由企业”，“鉴于统制企业和日满的关联及企业相互间的联系，使之作为国策会社进行综合性的监理经营”。但是，日本垄断资本向来对关东军在伪满洲国实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和满铁成为日本对满投资的主要渠道，心怀不满，“七七”事变后可以说更发展为公开的反对。与此同时，关东军与日本新兴财阀日产秘密筹设的满洲重工业会社，又于“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11月8日突然宣布成立，满铁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挤出伪满的重工业。这样，“使满铁进入华北的运动更具有有一种悲壮之感。”（注：“事变后日本大陆经营的政治动向”，第51~56页。）同年12月14日前往东京的松冈洋右又向政府提出第二个方案，即满铁垄断经营华北的铁路与煤矿（注：“事变后日本大陆经营的政治动向”，第51~56页。）。可是，另外设立华北开发会社的方案，当时已被日本内阁的对华决策机关——企划院第三委员会所敲定。时至今日，就连华北方面军也加入了反对满铁进入华北的大合唱（注：据中村隆英：《战时日本的华北经济支配》，第142~145页载，1937年9月30日，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基本要纲案》和《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案》，并于10月15日提交日本陆军省，当时尚无排斥满铁之意*）归纳起来，满铁被拒绝的原因有二：一是“缓和对中国民心 and 外国权益的刺激”，因为满铁在中国的名声很坏，而且它实行的是以日本国家资本为主的垄断经营；二是“国内资本家拼命地反对满铁垄断大陆，和现地海军以及国内官僚们、一般经济界对关东军——满铁政治亲密关系的忧虑”（注：“事变后日本大陆经营的政治动向”，第51~56页。）。此外，日本实施战时经济伊始便面临资本市场拮据情况（注：据满铁调查部：《作为大陆经营资金渠道的满铁地位》，满经（二）之（4），极秘，打印件，1938年8月载：当时日本、伪满和华北战时经济计划，共需资金100亿元，而当时日本财界投资能力仅为20亿元。），也促使日本政府在做出决策时不得不考虑更多地吸引日本私人资本以至中国当地资本。但另一方面，始于1938年的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其核心又正是建立与强化战时经济统制，日本占领的华北沦陷区也不能背道而驰。所以，只能是：既要缓和“严格的统制”，又必须避免“自由企业”的“无统制的弊端”。这样，根据1938年3月15日日本内阁决定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设立纲要》，和4月30日第73次国会通过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法》而设立的华北开发会社，与满铁不同，它不直接进行经营，而是通过投资和融资，对特定产业进行所谓“统筹调整”；其所属的各特定产业的子公司，大部分是普通法人。

在这种情况下，事变后实际已成为制定华北经济掠夺政策与计划中枢的满铁华北事务局调查室，在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指使下，从1938年2月起，主要起草华北开发会社及其下属子会的组织与经营方针。当时，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筹调整”的“特定产业”被法定为：主要交通、港湾、通讯、发送电、矿业、盐及盐利用工业，以及“其他经政府批准的事业”。对于这些产业，按“内行”和

“冠军”的原则，由日本资本集团所瓜分。1938 年 4 月，满铁华北事务局调查室提出的《关于设立子会社的一般要纲案》规定，“重要产业的开发，以一业一社为原则”，除交通和通讯会社外，“开发会社持有子会社半数以上股份”（注：“北支那产业开发计划资料”，第 97 页。）。这一方案几经修改。后来，在 1938 年底兴亚院及其地方机关设立前被命令停止起草活动。但以后作为各会社的设立方案的基础，而被利用。

在满铁华北事务局调查室受命草拟华北开发会社及其各子会社设立方案的前后，即 1938 年 1 月和 6 月，还受方面军特务部之命，计算华北主要资源对日供应的可能量，并编制华北开发四年计划。对于前者，调查室认为，应首先确定主要资源“开发”的长期计划，于是着手制定华北产业九年计划。到 1938 年 3 月 30 日，经过五次会议讨论、审议和修改，按华北产业九年计划，到 1946 年，各种主要资源产品的产量和对日供应量为：煤炭——6000 和 3100 万吨；铁矿——270 和 135 万吨；生铁——87 和 38.9 万吨；矾土页岩——40.7 和 36.2 万吨；盐 249.4 和 161.4 万吨；液体燃料——105 和 98.7 万吨；棉花——59.7 和 25.6 万吨（注：“北支那产业开发计划资料”，第 97 页。）。

至于华北产业开发四年计划，亦即所谓的华北生产力扩充计划，是 1938 年 12 月 9 日才修改完毕而向日本企划院提出的。其目标是，到 1942 年，各项资源产品的产量和对日供应指标为：煤 2400 和 800 万吨；铁矿石 192 和 75 万吨；盐 207 和 105 万吨（注：“北支那产业开发计划资料”，第 188 页之次《北支（含蒙疆）生产力扩充计划总括表——交通、矿工部门》。）。1939 年 1 月日本生产力扩充计划确定时，该计划和伪满产业五年计划一并成为附件。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成立后，起草新的华北产业开发计划时，上述计划都成了基础。

结语

满铁因被挤出伪满重工业和称霸华北经济的野心落空，在经营方针上，转向以铁路、煤矿和调查为三大重点。1938 年 3 月 30 日，曾经拉起架式准备主宰伪满和华北的所谓“产业开发”的满铁产业部，被改组为调查部。到 1939 年 3 月，满铁调查部又扩大为以“东亚”为对象的大调查部。这时，不但华北经济掠夺总枢纽——华北开发会社早已成立，而且，以满铁人员和资本为主导的华北交通会社也已面世。原满铁华北事务局调查部大部分人员则组成为华北经济调查所，它在满铁大调查部统辖下，成为对华调查机构的重要一环而继续活动。此后的满铁调查部主要进行所谓综合调查，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以上“七七”事变前后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活动来看，满铁的调查确实具有国策性、基础性、现地性，这是满铁调查机关自认的特征。但应指出，国策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满铁的现地基础调查，归根结底也是从国策（特别是侵华国策）出发的，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调查研究活动。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1998 年 06 期

滿鐵殖民統治

政策的確立、實施及影響

沈燕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长春 130051)

摘要：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产物，作为日本的国策机关，满铁担负着国家的使命，表面经营铁路，实则侵略扩张。从建立到灭亡，在中国大地上盘踞长达 40 年之久，长期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掠夺东北的物质资源，并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及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提供经济上的支撑，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活动保驾护航。因此，满铁殖民统治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其影响，是值得我們认真研究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满铁；殖民统治；侵略；掠夺

满铁是一个什么样机构，它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它与日本的侵略战争有什么样的关联以及给中日两国乃至全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解决的课题。本文试图从满铁殖民统治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影响进行阐述，用历史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方法，全面系统地剖析满铁的本质以及它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旨在从中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滿鐵殖民統治政策的确立

(一) 满铁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产物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内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阶级为了转移国内日益增长的矛盾，急于抢占中国和朝鲜市场，确立了掠夺资源和扩张领土的策略。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煽动武力对朝鲜、中国东北进行侵略，妄图成为“东洋盟主”。在日本内部逐渐形成了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基本路线，即所谓“大陆政策”。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大陆政策”是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至1945年军国主义政策失败为止，日本对朝鲜、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进行武力侵略战争，以求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总体政策。

“大陆政策”出笼后，日本军阀即把“大陆政策”变成了侵略的实际行动，先后对台湾和朝鲜发动侵略战争；1894年7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日本和沙俄都是中国的邻国，一直垂涎中国东北。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密约，俄国取得在东北的筑路权和租借旅顺、大连的特权。东清铁路的建成，加强了沙俄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当欧洲或东亚发生政治纠纷的时候具很大的作用”，“控制太平洋上一切国际商务运动”，“把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中”。沙俄的野心，不但触犯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更主要的是阻碍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日俄矛盾突显出来。

1904年2月18日，在英、美、德等国的支持下，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了日

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权益争夺战，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日俄两国于 1905 年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条约》第六条规定：“俄国以中国政府之承认，将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并同地方附属一切权利、特权及财产与一切经营之煤矿，无条件让与日本。”也就是俄国同意将东清铁路支线长春以南段称南满铁路让给日本，长春以北段称北满铁路仍归俄国所有。日本在中国大陆有了一席之地，为了经营铁路及附属地，也为了在中国东北设立一个侵华的大本营，于 1906 年，设置了一个半官方的企业，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实际上不仅公然涉足于政治、军事、情报等领域，而且还拥有极为显赫的权势。这个机构便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二）以满铁为中心的殖民政策

1906 年 1 月，日本政府就如何经营南满铁路，成立以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的《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1906 年 6 月 7 日，明治天皇以 142 号敕令，公布了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文件，该文件共计 22 条款项。7 月 13 日又成立了以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委员会”。1906 年 9 月，日本召开“有关满洲问题协商会”，确立满铁殖民统治的方针，内容包括土地、港湾、产业、教育、税制、警察、卫生、道路、电气等多方面，甚至火葬场、墓地等都纳入其中，把满铁作为日本实现大陆政策的执行机关。1906 年 11 月 26 日，日本在东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任命后藤新平为满铁总裁。

为了强化以满铁为中心推行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政策，给予满铁总裁后藤新平至高无上的权力：一、由满铁总裁兼任关东都督府顾问，关于行政应都督谘询，并授以开陈意见之职权；二、就职前给与亲任官职，就任后享受亲任待遇；三、就任满铁总裁后任台湾总督府顾问，过问台湾政务；四、政府不干涉任选满铁副总裁和各理事问题；五、比例以现任官员受聘满洲铁道者与受聘外国政府者同一待遇。特别是第一条，即“满铁总裁位于关东都督之下，同时复充任都督府顾问，在外务大臣监督下参与都督府一切政务”。1906 年 8 月，后藤新平给关东都督大岛大将的信中断言：“所谓铁路事业对于经营满洲，名虽视若等闲，实则为其主责，故军事行政一切之措施，表面上制约铁路事业，但究其实，不可不为铁路事业所制约。依余之见，身为满洲铁路总裁，倘非实际与闻都督阁下之一切重要事宜，并认承其有论述可否之能力，恐将不能责以大成。”后藤新平就是按照这一主导思想，还要求外务大臣“将经营满洲的实际大权委之于满铁总裁”。为实现后藤称之为“在殖民地政务之体统上属于破格百例之措施”，外务大臣林董辞职。这种以满铁总裁为殖民政策中心的体制，实际上也是日本推行以满铁为中心殖民统治政策的具体体现。满铁总裁在东北的中心地位一直持续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

（三）文装的武备经营满洲之核心体系

后藤新平是“最早施展其行政手腕的官衙”，他被日本人称为“日本都市计划之父”。在后藤新平任台湾总督时便利用人性的弱点，提出“治台三策”：台湾人贪生怕死，得用高压手段威胁；台湾人贪财爱钱，可用利益诱惑；台湾人非常爱面子，可用虚名拢络。”并以此采用“糖饴与鞭”的两手策略：一方面以严刑峻法对待异议人士；另一方面积极致力于台湾经济。就任满铁总裁后，更是采取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殖民政策。

在对南满铁路如何经营的问题上，后藤新平拟订的《经营满洲策略概要》，

明确指出：“经营满洲唯一的秘诀就是表面上装做经营铁路，暗地里则需要充实各种设施。根据这一秘诀，租借地内的统治机构和经营铁路机构要截然分开，经营铁路的机构必须装做除铁路之外，与政治、军事全然无关。……作为经营铁路的机构要另立满洲铁道厅，把它作为政治的直辖机构，负责经营铁路，守备路线，开采矿山，奖励移民，建立地方警察，改良农工，与俄国、清政府交涉事宜及整理军事情报工作，平时监管培训铁路人员的技术教育。”

满铁章程规定，最初的资本总额为 2 亿元，共分 100 万股。只有中日两国政府方可认购入股，其中 50 万股由日本政府认购。而日本政府以沙俄在日俄战争失败后交给日本的铁路经营权、矿山开采权及附属地的一切财产充之。另 1 亿元，以 2000 万元招募股份，8000 万元发行招募“满铁”债券来解决。招募的股份每股 200 元，共 10 万股。日本政府为行使对满铁的绝对控制权，将 10 万股的民间股东人数分散多达 10912 人。从资本运营及日本政府的命令和满铁章程中等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民营公司性的组织”但绝非是自由企业，它是一个严格按照国家特殊要求和规定来予以运作的公司。在满铁组织内的每一个细胞中都体现出它是代表日本政府意志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国策会社”，是日本侵华的重要机构。后藤新平宣称，要把满铁建成“帝国殖民政策和我(日本)帝国发展的先锋队”。

1908 年，后藤新平提出“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的“文装的武备”殖民统治政策。不仅发展经济，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殖民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以征服人心，构成潜在军备。具有代表性的有大连医院、旅顺工科大学、满铁中央试验所以及新闻机构等设施。此后，满铁把大连作为投资重点并以其为殖民扩张轴心，扶植南满铁路的运营，续建、扩建大连港口，发展工业，开展贸易，兴办教育，使大连按照他设计的殖民地模式发展起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按照后藤殖民统治政策一步步发展壮大。后藤新平作为满铁的首任总裁只任职两年多的时间，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以一个“殖民地经营家”的角色，制定了满铁的基本发展方向。

二、满铁殖民统治政策的实施

(一) 满铁附属地的建立

满铁在 1907 年 4 月 1 日开业时，从日本政府接收的铁路用地包括旅大租借地内外合计为 149.71 平方公里。“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从俄国手中接管的土地”即原东省铁路所属土地和战争期间“日本陆军购买于中国地方或以某种理由没收的土地”以及“满铁从中国地主手中收买的土地”、“在开放码头时，日本人作为永久租用的土地。”这些土地归满铁管辖，即满铁附属地。1908 年满铁附属地面积达 182.76 平方公里，1912 年以后，满铁通过收购或赠筑新铁路的方式，不断增加铁路附属地面积。由最初铁道用地的扩张，转向长春、安东、抚顺、鞍山、奉天、营口、公主岭等城市铁路附属地的新设和扩大上。仅以长春附属地的扩建为例，可以看出日本之不择手段扩大附属地。1907 年 6 月，日俄两国就宽城子火车站归属问题开始谈判，经过讨价还价之后达成协议，俄国宽城子火车站和俄国附属地归两国共管。俄国为了保持独有权，于 6 月 13 日购买了日本二分之一的所有权。俄国保持了长春宽城子火车站和附属地，仍然将宽城子火车站作为北满铁路终端站(1936 年方由日本在苏联手手中购回管理权)。1907 年 6 月，日本在宽城子火车站旁一里地方(今长春客车厂附近)修建一座简易的火车站，名叫西宽城子临时火车站，作为南满铁路的起点站。日本还不甘心这种结局，

以修筑“长春驿(今长春火车站)和开辟市街区域的用地”为由,趁长春开辟商埠地机会,以铁路用地为借口,不经中国政府同意,秘密地采用各种手段向中国居民购买强征土地。后来经过中日交涉,长春府同意日本购买修建火车站所需土地,并具体规定头道沟及其偏东地段,可以由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承买。由日本陆军省派往满铁执行特殊任务的左藤安之助少佐完成收买土地的任务,而建立长春车站的位置是由日本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亲自授意。

至 1931 年前,满铁附属地已增加到 482.9 平方公里,到 1936 年底增加至 524.3 平方公里。最大的附属地是抚顺,面积为 59.5 平方公里,其次是鞍山的 19.8 平方公里。附属地面积超过 5 平方公里的就有七个城市:奉天、开原、铁岭、公主岭、辽阳、四平街、长春。超过 1 平方公里的城市则更多,主要有:熊岳城、安东、大石桥、昌图、泉头、盖平、烟台、瓦房店、海城、陶家屯、得利寺、苏家屯、营口、新台子、蛇牛哨等地。满铁通过附属地来控制着大半个东北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控制着文化教育,大力推行亲日教育,这在日本侵略整个东北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攫取控制东北的交通煤矿企业

侵略和掠夺是满铁一切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侵略是掠夺的前题,掠夺是侵略的终极目的。满铁“其性质与英国之东印度公司相同”,“专以边界殖吾(中国)满蒙为务”,“不仅经营铁路一端,并经营海运、港湾、矿业及制铁事业、电气、煤气及旅馆、地方事业等五项。”

1907 年 4 月 1 日,满铁开业时,它所管辖的铁路有干线:大连~孟家屯 695.2 公里,同年 7 月又接收孟家屯以北 8.5 公里,共计 703.7 公里;支线:旅顺支线(南关岭—旅顺)29.63 公里,树屯支线(大房身—柳树屯)3.58 公里,营口支线(大石桥—营口)32.2 公里,烟台煤矿线(烟台—烟台煤矿)15.61 英里,即 150.6 公里。干线与支线共计为 854.3 公里。

为了提高运输能力,开始扩轨工程。到 1934 年大连至长春间的铁路扩轨工程全部完成。为了便于对抚顺煤炭的大力掠夺,还实行了铁路电气化,并将原铁路的间隔定为 5 米,使用 100 磅的重型轨条。为了便于铁路的辅设,还在沿途设立铁道工厂,霸占大连港和旅顺、营口、安东码头。为了全面垄断东北交通运输,对中国自办铁路进行无理阻挠。1928 年 8 月由奉天省自办从沈阳以抚顺至朝阳镇全长 263 公里铁路的竣工,直接威胁到满铁利益,满铁即通过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驻北京公使提出抗议。关东军参谋长甚至致电日本陆军参谋部,主张“不错过武力解决的机会”。..

满铁除了经营铁道、水运、航空等交通运输业务外,还经营抚顺、烟台的煤矿、冶金、电气、农林畜牧、文化、教育、旅游等业务,旗下拥有鞍山制铁所、轻金属制造、镁工业、采金、铅矿、矿业开发、电业、化学工业、同和汽车、盐业加之遍布东北主要城市的医院和大和旅馆等多家会社和文教科研医疗机构。抚顺素有煤都之称,煤层厚,储量大,煤质佳。日俄战争后,日军占领抚顺,立即成立抚顺采煤所,强行将抚顺煤矿的老虎台、杨柏堡、千金寨三处矿井抢占。1909 年满铁采取各种手段将号称东亚第一大煤矿的抚顺煤矿纳入囊中,并进行破坏性的开采。1918 年 9 月,攫取了新邱煤矿全部 12 个矿区的土地 1594 天(天,为东北辽南辽西一带使用的土地单位,一天为 10 亩)。满铁利用号称“新邱炭坑”的大新、大兴公司全面经营煤矿,1920—1928 年“新邱炭坑”的产煤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1920~1928 年“新邱炭坑”的产煤量

1920 年	13750 吨	1921 年	4863 吨
1922 年	9600 吨	1923 年	4581 吨
1924 年	17033 吨	1925 年	10933 吨
1926 年	17089 吨	1927 年	8651 吨
1928 年	4216 吨		

除上述外，满铁还疯狂掠夺中国东北粮食，据不完全统计，战时满铁每年将东北粮食总产量的 40%~50% 强制掠夺，至使东北各地饿殍遍野、易子而食，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通过疯狂掠夺东北资源，奠定了“以战养战”的物资基础。满铁社员由成立初期的几千人发展成拥有 50 万员工的日本最大的海外殖民机构，成为盘踞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的吸血鬼。

(三) 建立庞大的情报调查机构

满铁成立之初，将调查部列为公司章程中，与铁路、煤矿、地方经营并作为满铁四大支柱。后藤按照他设计的“文装的武备”的“经营满洲”的政策，为调查部规定的任务是：“在满洲及其附近地区从事一般经济及惯例的调查”。III1 这里指的附近地区是“以西伯利亚为中心的帝俄，而其一般经济调查则是情报资料。正如山田豪一总结的那样：“满铁的调查机关是后藤的积极经营满洲政策的体现”。满铁的一系列调查活动都是严格按照这一宗旨进行。

随着满铁业务的扩大，满铁调查工作也在顺利进行。调查目的更为明确，主要从事关于各种调查、统计事项、营业报告及年报的编纂。加强了资料室的建设，推行剪报和资料卡办法，编纂资料索引、图书目录等，并出版了《满蒙全书》。时任调查课长的石川铁雄在序文中说到，该书是向中外介绍已成为国际关系焦点的“满蒙的自然的及文化的全貌”。到 1927 年，调查课分为法制、产业、商事、贸易统计、交通、俄国、资料、庶务 9 个系，可以说具有相当的规模。调查课从成立到 1932 年 12 月撤废为止的 25 年里，先后出版《满铁调查资料》162 种，资料汇存 12 种，交涉资料 20 种，调查资料 11 种，调查报告 26 种，各种小册子 75 种，有俄文翻译资料、汉译调查资料和关于东北和华北的各种经济统计等等。

在满铁内还相继设立了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东亚经济调查局、满洲和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满铁情报课、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等调查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满铁情报课。1927 年 4 月 1 日，满铁将调查课情报系升格为情报课，下设情报系和弘报系。情报课在各地满铁公所和办事处，遍设情报人员和它的联络员一起组成情报网，并和陆军特务机关建立密切联系。有中国浪人、记者、军人出身和情报行家等构成。新设的机构弘报系影响最大，弘报即宣传的意思，用弘报而不用宣传，是为了避欺骗之嫌。弘报系的工作有：制作宣传品、招待名士、制作歌谣、照片、电影、博览会等。这个机构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十分活跃，在煽动侵略气氛上起了极大作用。据满铁资料披露，最盛时期情报收集人员达 4500 名，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研究与宣传的人员达 2000 多名。共完成调查报告约 1 万份，几乎每天有一份调查报告出笼。一些诸如“中国抗战力之调查”、“远东苏军后方调查”等调查报告，对日本当局的决策起过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还有搜集的各种情报、档案、书籍、杂志、剪报等，竟达二、三十万件，出版图书资料及杂志数千种。人们常将满铁称为 20 世纪前半叶世界三大情报宝库之一，它所掌握的资料不逊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

三、满铁殖民统治政策的影响

(一) 利益受损策动支持“九一八”事变

1924年,中国东北地方政府为了打破满铁垄断东北铁路的局面,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并先后修筑了吉海、昂齐、齐克、洮索、大通铁路11条,总长1609.344公里。1930年春,东北交通委员会在东北政府指示下,还准备修筑满蒙三大干线,即:东大干线、西大干线、南大干线。三大干线总长上万公里,支干线多达35条。东北铁路的修建,打破了满铁的垄断局面,给满铁带来了“致命影响”。满铁决心阻止中国在东北修筑铁路,于1928年5月,趁张作霖在北京败北之机,迫使张作霖答应“满蒙新五路”计划,遭到张作霖的拒绝后,阴谋策划炸死张作霖。张学良继任后,不但东北易帜完成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且断然拒绝承认“满蒙新五路”计划,重创了日本企图扩张侵略势力、分裂满蒙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满铁大造舆论,声称,张学良的“包围满铁的政策”威胁到日本的“生命线”,让日本政府感到“满铁的危机就是日本的危机”。并会同关东军,于1931年又先后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为借口挑起事端。满铁旗下的“满洲青年联盟”、“东亚经济调查局”和日本国内以及中国东北地区其他一些日本右翼团体纷纷进行反华活动。“满洲青年联盟”提出“武力解决”、“满蒙独立”的主张。这一主张也成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动因。

“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约有一万兵力,很难独立进行,满铁全力的支持和驻朝日军的越界支援是必不可少的。满铁早已作好应对紧急情况准备。1931年6月,朝铁、满铁、参谋本部相关人员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交通联络会上,十河信二理事代表满铁强调,制定非常时期的交通运输计划十分必要,明示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就派兵越界支援一事与朝鲜军参谋神田中佐(数次往返于大连、汉城之间)紧密联系,也取得朝鲜军司令官林镜十郎的承诺。制造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也经常神秘地往返于关东军、军部、满铁、驻朝日军之间充当联络角色,为关东军挑起事端进行准备工作。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关东军自行炸毁奉天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向沈阳驻军地北大营发起进攻。事变爆发后,满铁立刻下达了《非常动员令》,“在部内设置了临时时局事务所,处理有关各项事务”。“设置了临时奉天铁道出張所。同时,随着战局之展开,又在四平街、长春、营口、哈尔滨、洮南设置了时局事务所派出所,由奉天出張所统辖。接着,满铁又在全满四十个地方分别建立了无线通讯所,保证了关东军之行动无任何后顾之忧”。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即宣布成立与满铁联合铁道线区司令部,组织大规模军运;而驻朝日军在19日拂晓前,由各地抽调部队组成第三十九混成旅团,也全部分乘6个军用专列分别从平壤和龙山出发。据统计,1931年9月至1932年3月,满铁共编发军用列车4056列次(其中军运列车3011列次,装甲列车1045列次),平均每天为关东军编发军列22列次。

1931年9月~12月,满铁向“社外线”派遣军运员工为144758人次(实际派遣人数为7672人),1932年达328918人次(实际派遣人数为8803人)。在满铁近4万名员工中,有22254人(占满铁社员总数的57%)因参与“九一八”事变而“立功”受奖。22个地方事务所和地方公所,鞍山制铁所、抚顺煤矿等众多满铁旗下的部门,向关东军、日本领事馆、伪警察署等机关,提供了数万份军事、时局对策等方面的情报。

满铁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而支出大量的经费。1931年度支出事变费总金额为430.26万元(其中支付给军部101万元,支付情报费5.94万元)。1932年度支出事变费总金额为576.59万元,并透支1933年度事变费158.37万元。

在满铁 1100 公里的铁路沿线，铁路附属地总面积达到 480 平方公里。除为关东军提供住处、饮食等一系列供给外，满铁附属地内的 20 万日本侨民全部武装。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在乡军人联合会”并在各地设有支部和分会。事变后，各在乡军人分会都组织了自警团、义勇团，后统一改称自警团，其人数以万计，统由设在关东军司令部内的联合支部指挥，直接参与军事侵略行动。满铁还包揽了关东军占领区的政治工作。

由此可见，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没有满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全力支持，特别在水陆交通方面提供的快速有效的军事运输保障，关东军根本无法达成部队调动的高度机动性，也就无法实现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写给满铁总裁的感谢信中说：“大作战无铁道难以实行，机动作战愈来愈依存铁道放出光彩。关东军的神速行动，实际是以帝国实力为背景的满铁的俨然存在之所赐。”

（二）军财一体炮制伪满洲国

事变当初，满铁虽帮助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根据日本若槻内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内田总裁及满铁理事会采取了“对军方不协助，对事变不参与”的观望态度。“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命令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满铁对关东军一概不得协助。”为了解事变真相，币原命令满铁“正副总裁希即来京汇报满洲事变情况”。内田临行前，于 10 月 6 日下午，偕同江口定条副总裁在奉天关东军司令部，与本庄司令官及其幕僚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本庄中心围绕建立新政权，提出如下原则：“一、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二、满蒙统一于一个政权；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质上则须掌握在我们手里……至少也要掌握军事、外交、交通、的实权。”表示坚决反对同中国谈判和撤兵，拒绝国联或美国的干涉。同时他恳求内田：“此次事变的结局，从我国目前的大局来看，最终还须烦请阁下尽力，希望阁下能体察我之诚意，进京后与政府要员充分交换意见，竭力帮助为盼。”内田对这次会谈十分满意，甘愿充当关东军的代言人表态“须举国一致应对事变，既然事件已越过万里长城，就应作为与中国本土间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来妥善处理。”这使“处于孤军奋斗状态的关东军干部……因获得国家重臣满铁首脑内田伯爵的共鸣，简直高兴到了感激涕零的地步”。这次会谈让满铁和关东军军财一体，对后来的事变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东军也实现了这次会晤的主要目的：一方面使满铁趁机全面夺取利权，另一方面借助内田满铁总裁的影响力取得国内军、政当局的全力支持。

由于内田等积极而有力的游说活动，很快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使关东军在 3 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东北全境，并将关东军早就确定了以溥仪为首建立伪满政权提到议事日程。1931 年 12 月 13 日随着犬养内阁的成立，新任陆相荒木贞夫批准制定了与关东军主张完全一致的《时局处理要纲案》。

1931 年 12 月 10 日，国际联盟就“九一八”事变通过决议——派遣调查团赴现地调查，日本决定在调查团到来之前抢先成立伪满洲国。筹建伪满洲国的组织和策划工作，大部分是由满铁社员承担。1931 年底，满铁派社员共有 293 名参与伪满洲国的建立工作。他们与关东军共同组织策划召开“建国会议”，并于 1932 年 3 月 1 日，正式成立伪满洲国，3 月 9 日，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举行执政就任式，内田和本庄一起出席了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典礼。由于内田康哉的威望，在执政就任式上代表日本政府致辞。

满铁不仅参与伪满洲国的建立，很多满铁社员都在伪满洲国各级组织担任要职。“像早年在乡下唱野台子戏开场的头一天一样，谁来的早谁就可以先抢个位

置。所以，像满铁的一个卫生课长一跃而成为奉天省的总务司长，本来对司法一窍不通的一个医院的事务长也居然摇身一变而成为司法部的总务司长，这种事例屡见不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当时日本《改造》杂志并不隐讳这个事实，称之为“满洲国国务总理”和“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驹井德三秉承的是“关东军司令官，并不是溥仪这个名义上的执政。”驹井德三在执行关东军命令，控制伪满洲国方面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满铁社员、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1931年，他从满铁辞职，投入到建立伪满政权工作中，伪满洲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伪奉天省总务厅长、伪滨江省总务厅长、伪间岛省省长(日本人中最早担任伪省长的人)。七七事变发生后，又出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席顾问。在炮制、控制伪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伪满洲国里，“大批满铁社员获得了抛头露面的机会。”

“军财一体”制造了“九一八”，它是“武力与资本的结合”，满铁是最大的赢家。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与伪满洲国签定的《日满议定书》中规定：满铁完全控制了东北的铁路、矿山、港湾等三大产业，以“特殊会社”或“准特殊会社”的形式垄断着东北的经济命脉。关东军要求伪满洲国必须确保满铁(包括后来的“满业”)的投资利润率不得低于13.6%。1932年~1936年间，满铁利润收入就达1.9亿日元。1935年，日本政府以伪满洲国的名义买回苏联北满铁路，也交给了满铁，使满铁经营的铁路线路多达1732.8公里，资本金达4.4亿日元。

(三)焦土外交将中日两国拖进战争泥潭

“九一八”事变后，军国主义抬头使得日本军部的发言权越来越重，军人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重。由于对华政策存在分歧，犬养毅内阁失败，犬养毅本人也被日本激进军人杀害在首相官邸，由海军大将斋藤实组建新内阁。1932年5月，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被任命为外务大臣。1932年8月25日，日本国会召开临时会议，内田康哉出于保卫满铁利益，宣称：“满蒙事件是我国发动自卫权，正大光明，毫不羞耻，正像森恪先生刚才讲的那样，‘对于满洲(国)问题，不是单纯承认就完事大吉了’，我国民必须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坚持主张，一步也不能退让，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九一八”事变后的“焦土外交”政策就是这样产生的。并于同年9月15日正式承认伪满，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意欲永远独占中国东北。日本的侵略行径使英美法等国的在华利益及远东国际地位受到严重损害。1933年2月24日，英美法利用国联通过决议，宣布伪满的建立不符合国际法普遍公认的原则，要求国联及其成员国均不得承认伪满；劝日军撤出中国东北，把东北作为各国“共管”的自治纲领。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十分孤立与尴尬，立刻退出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指责国联采取“不公正”的态度，声明日本自即日起正式退出国联。此后日本便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在国联会议上，松冈退出国联会场，这种强硬姿态正是日本朝野意志的表现。一时间，松冈被视为日本的“英雄”，《妇人公论》也把松冈誉为“征讨国联的桃太郎”。

日本一方面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保护“满蒙利益”，一面调整和加速侵略步伐。为了实现“大陆政策”，侵占中东，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目标，日本制定了南北并进的国策方针。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不断扩大战争规模。1938年和1939年，分别对苏挑起张谷峰事件、诺门坎事件，以日本关东军败北而告终。日本侵略之心不死，于1940年9月27日，与德国、意大利三国在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三国公约)，成立以柏林—罗马—

东京轴心为核心的军事集团。也就是后来的“轴心国”。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侵略触角遍及东南亚各国，将中国及亚洲各国都拖进了战争的泥潭。

随着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的推进，满铁也随着关东军指挥棒，开始向华北进军。满铁先后成立“北支事务局”（原称天津事务所）、“兴中公司”和“华北产业开发会社”等大型垄断机构，为掠夺华北战争资源，聚敛战争资金，支撑侵略战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仅 1937 年 7 月到 1945 年 8 月，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 4000 起，遇难的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26 省 1500 余县市，面积 600 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 2 亿人以上。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几被侵略者洗劫一空。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 1000 亿美元，间接损失达 5000 亿美元。

战争也给日本人民也带来了不可忘记的灾难。随着日本侵略战线的扩大，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已经形成，1945 年 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却拒绝接受。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美国把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投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约 20 万人的重大伤亡，城市遭受毁灭性的打击。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9 日苏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击，10 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此时，所有中国战场上的抗日武装力量开始向日军展开了全面反攻，日本侵略战争全线溃败。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 月 15 日中午 11 时，日本天皇裕仁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结语

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的大陆政策也以失败而告终。1945 年 9 月满铁被盟军勒令关闭。作为日本的国策机关，满铁担负着国家的使命。从建立到灭亡，在中国大地上盘踞长达 40 年之久。长期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掠夺东北的资源，并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及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提供经济上的支撑，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活动保驾护航。可以说满铁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执行者和实施者。

参考文献：

1. 日本侵华“理论”之 1868 年明治天皇的大陆政策 2005
2. 长春厅志·长春县志 2002
3. 付孙铭沙俄侵华史简编[增订本] 1982
4. [日]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 1919
5. 鹤见祐辅 后藤新平
6. [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
7. 所谓南满铁路附属地 1933
8. 鹤见祐辅 后藤新平 1983
9. 冈松参太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会议ヲ官有トシ公法上ノ财团法人ト为スノ议
10. 顾明义大连近百年史 1999
11. 满史会；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满洲荆发四十年史 1987
12. 杨碧川后藤新平传：台湾现代化奠基者 1996
13. 苏崇民满铁史 1990
14. 朴茨茅斯和约第六条
15. 查看详情
16. 满铁史资料

17. 石堂清伦十五年战争和满铁调查部 1986
18. 山田豪一满铁调查部
19. [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三十年略史
20. 1930 年秋成立的满铁另一组织——大雄峰会(笠木良明为首),“九一八”事变前并无大的活动,但因其主张“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以建设五族(即日、汉、满、蒙、鲜)协和的王道乐土”,故也是主张向我国东北和蒙古进行侵略扩张的反动组织.有学者将“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统称为法西斯组织,从两组织表现和主张来看,如此定性,亦无不可
21.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1)满洲事变前夜
22. 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 1956(12)
23.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
24. 满史会;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 1987
25. 满铁满洲事变记录
26. 满铁满洲事变と满铁 昭和 9 年
27. 山口重次消之た帝国・满洲
28. 草柳大藏;刘耀武满铁调查部内幕
29.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10 月 6 日) 1965
30. 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
31. 森岛守人;赵连泰阴谋·暗杀·军刀 1980
32.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 2007
33. 依据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3)·伪满傀儡政权 1994
34. 解学诗武力与资本的新结合
35. 東北淪陷 14 年史総編室;日本殖民地文化学会満洲国とは何だつたのか 2008
36. 原田勝正満鉄
37. 《第 63 回帝国議会(臨時)眾議院議事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 アレ ンスコード
38. 戸川猪佐武近衛文麿と重臣たち 1982
39. 抗战赔偿委员会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

原文出处:《日本侵华史研究》2013,4(4)

日本關東都督府的東北調查

王铁军*

内容提要: 本文以日俄战争日本在辽东半岛租借地设立的关东都督府为研究对象,以档案文献资料中记录的关东都督府对东北调查文献为研究中心,探讨了关东都督府对中国东北军事、农业、工业、矿山、森林资源、交通、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调查规模、范围及东北调查背景。

关键词: 关东都督府 东北调查 刊行物

日本关东都督府为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大连、旅顺、金州等辽东半岛地区设立的租借地管理机构。关东都督府下辖民政部和陆军部,分别负责管理辽东半岛租借地内的民政和辖内的驻军。其间,关东都督府经过了几次改组。其中,1919 年关东都督府经过机构改组,原关东都督府内设的民政部被改组为关东厅^①,原关东都督府内设的陆军部则被改组为关东军司令部。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厅又被改组为“关东州”。

关东都督府是续“满铁”、日本总领事馆之后日本在东北设立的三大机构之一。关东都督府也同“满铁”一样,在其内部专设机构,负责东三省政治、经济、物产交通、军事国防、自然地理和文化教育动向调查。

有关日本对东北调查的研究中,有关“满铁”调查部对于东北调查的研究论述较多。相比较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于日本关东都督府的东北调查的研究论述不多^②。

鉴于上述情况,本文以日本各研究机构及公共图书馆所藏的关东都督府各种东北调查报告集、出版物以及日本国内各文书馆馆藏相关档案文献为线索,厘清关东都督府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各种东北调查情况,并试图以此为研究中心探讨关东都督府对东北所进行的各种调查的调查内容、调查目的等。

一

关东都督府成立于 1906 年 9 月,系由日俄战争期间成立的关东总督府改组而成,负责管理从沙皇俄国手中接手的大连、旅顺、金州等辽东半岛租借地。按照日本相关的官制规定,关东都督府由都督、民政部和陆军部组成。其中的民政部下辖庶务课、财务课、土木课、警务课、监狱署等^③。按照地域划分,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的调查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大连、旅顺、金州等辽东半岛租借地内的调查。有关这一部分的调查情形,由于受到所藏档案机构的借阅限制,目前尚不能通过档案文献的查阅了解其中的具体详情。从我们目前查阅到的文书馆和档案馆中相关文献目录上,日本关东都督府自设立之初,就开始了对辽东半岛租借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调查。这些调查包括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编写的《关于金州附近苇席生产流通调查报告书》、《瓦房店地区果物流通组合调查报告书》及《关东都督府内简易人口调查统计表》等,涉及辽东半岛边界地形、河流山川、辖内人口(职业、人口构成、收入等)、气象(含陆地和海上)、产业、土地(含城市内房屋所有人,农村土地所有人及佃农耕种、地租、地税等)、交通(含陆路和海上)、鸦片馆、农业(含经济果树种植和畜牧业)等。

关东都督府民政部调查东北地区的第二部分为辽东半岛租借地外的对奉吉

* 王铁军,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黑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调查。有关这一部分的调查不仅涉及范围广，涵盖了奉吉黑三省地区及内蒙古东部的广大地区，而且其调查的时期跨度也非常长，从 1906 年 9 月设立之初开始一直持续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时期长达近 40 年。就其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调查内容而言，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于奉吉黑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上述地区的商业、农业、畜牧业、特产、土地、交通、物价、租税等涉及东三省地区的商业贸易情况及各地政情和军情等内容。

从目前收集到的相关文献出版物看，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最早对东北及蒙古东部地区进行系列调查的日期始于 1910 年前后，早期的调查主要按产业进行了调查。从当时的相关刊物上看，这一时期主要的调查有《关于满洲大豆的调查》(1909 年 7 月刊行、1912 年 1 月再版)、《关于满洲棉布的调查》(调查人为山田亮、刊行日期为 1908 年)、《南满洲纸类》(调查人为小田关小郎、1916 年刊行)、《满洲柞蚕》(1917 年刊行)、《满鲜葡萄业视察报告书》(调查人为川上善兵卫、刊行日期为 1914 年)、《满洲大豆及加工品》(1915 年刊行)等^④。这些小册子页数少，装订非常简陋，除了注明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和刊行日期外，大多没有注明调查人员姓氏。其中，像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早期调查并刊行的小册子《关于满洲大豆调查》，其调查时期为 1909 年 7 月间，刊行日期为同年 12 月，页数为 211 页，B5 版纸型，手写刻字版印刷。

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地区及蒙古东部地区的大规模调查的高峰期为 1915 年至 1918 年间，其中这一时期对东北地区及蒙古东部地区所进行的“满蒙”经济系列调查最具典型意义。

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调查多以《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形式刊行。按照目前我们从国内公文书馆、图书馆藏书中收集到的相关出版物看，列入“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刊的有 11 册^⑤，按照内文及扉页上的序文，其调查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的东三省调查

丛书	调查者	调查期间	主要调查线路
第 1 册	北村吉藏、添田泽三	1915 年 1 月—3 月	洮南、郑家屯
第 2 册	添田泽三	1915 年 8 月—12 月	郑家屯、巴林府、林西县、赤峰、开鲁县、通辽县
第 3 册	宫崎吉藏	1915 年—1916 年	哲里木盟西北、黑龙江省及索伦部南部
第 4 册	三浦稔	1915 年 10 月—1916 年 2 月	赤峰
第 5 册	山科启吉	1915 年 11 月—1916 年 3 月	农安、扶余、齐齐哈尔
第 6 册	古曳好		旧海龙府辖之西丰、西安、东安、海龙、辉南、柳河
第 7 册	山科启吉	1916 年 7 月 1—同年 10 月 8 日	吉林中部地区
第 8 册	大神正节	1916 年 11 月—1917 年 3 月	林西、经棚
第 9 册	广大光治	1916 年 6 月—1917 年 3 月	扶余地区
第 10 册	三原作一	1916 年 9 月—1917 年 3 月	赤峰
第 11 册	宫崎吉藏	1917 年 7 月—1918 年 2 月	开鲁地区

表注：(1)本表依据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于 1915 年 4 月至 1918 年 4 月间刊行的《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所列内文及扉页。(2)表中地区名及地名为当时地名旧称。

其中，《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一册，^⑥由洮南(原属内蒙古，现属吉林省)方面调查复命书和郑家屯(现为吉林省双辽地区，下同)方面调查复命书两部分组成。依内文显示，洮南方面调查人员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嘱托”^⑦北村吉藏^⑧和添田泽三，调查期间为 1915 年 1 月至同年 3 月间，期间的调查路线为自四平站出发后，经八面城、三江口、郑家屯和巴音他拉^⑨后北上抵达图

什业图旗后，又西折经达赖汉王府领地后，穿行东扎鲁特旗抵达西扎鲁特旗王府所在地。在西扎鲁特旗王府逗留数日后，北村一行又返回西扎鲁特旗分歧点南行，经开通县⑩下辖的公营子、王家子、白塔子折回巴音他拉，其后经巴音他拉经由三江口、郑家屯原路返回四平站结束调查。北村等人在洮南地区的调查项目主要分为上述地区的自然地理地貌、道路交通及交通车辆、运费、城乡民居饮食起居（汉族人和蒙古族人）、家畜种类及数量和可供放牧的操场、牛马羊猪驴等家畜的死亡率和繁殖率、动物皮毛的产量、未耕地情况、农业耕作用具、土地所有情况、各地农产品收获、土地所有人与耕作人关系、农业移民与地租、传统手工业中蒙古纸、高粱酒、皮革加工、榨油、砖瓦业、土器制造、毛毡编织、染房、豆素面乳制品等的生产、产量、销售价格及销售渠道；黑林山煤矿的开采情况、动物皮毛的加工、外国日用品中各国商品比例、畜产交易价格、集市及使用货币（含各种货币兑换比率）、钱铺、大车店等主要服务业的规模、营业主等。

在郑家屯调查中，其调查项目主要被分为“一般事情”、“纯蒙古产业状态”、“蒙古主要城镇”、“金融事情”、“蒙古人的生活费及购买力”等六大项。其中，“一般事情”中主要调查内容为四平、郑家屯、开鲁县及巴音他拉地区的沼泽、山川、气候及上述地区内蒙古族居民的文字、人口、性格及衣食住行和宗教情况。“纯蒙古产业状态”调查项目中主要调查了上述地区蒙古族居民的畜牧饲养、农业耕作和工商业店铺及贩卖物品种类；在“蒙古主要城镇”调查项目中，北村等人主要调查了郑家屯、巴音他拉及开鲁县三个乡镇的交通运输（陆路和水运）、商店数量和种类及其中外国人经营的商店数量、日本商品种类情况；此外，北村等人还主要调查了上述地区商品交易及居民生活中商品买卖的各种货币兑换率、物价（家畜、日用品、食宿费用等）及金融机构（含钱铺、当铺、洋行等）；在“蒙古人的生活费及购买力”项目中，北村等人主要调查了当地蒙古族居民的年收入和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所用开销等。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二册全书由 221 页组成，活页印刷，竖排版，32 开普通装订（11）。以内文判断，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此次派遣的调查员为“嘱托”添田泽三，调查期间为 1915 年 8 月 6 日至同年 12 月 3 日，调查地路线为吉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郑家屯、阿尔科尔沁（现阿尔山、科尔沁旗）、巴林府、林西县、赤峰、开鲁县、通辽县等地。调查的内容主要为上述地区的商业习惯、交易物资种类、价格、方式、通用货币、商人出生地、商号、居民主要生活用品、年均消费物品种类、农业和畜牧业的主要经营种类、土地耕作法、兽医数量、相关收入、蒙古盐产地、所有人、经营者、蒙古盐的产量、主要流通方式、价格、税收等。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三册由 288 页组成（12）。调查员为官崎吉藏（旧姓北村），调查日期为 1915 年至 1916 年的冬季。调查路线为内蒙古的哲里木盟西北部和索伦部南部地区及黑龙江省的一部分地区。调查分为地理、畜牧业、农业、林业、工业、商业、金融、地方警备和官制等九项，调查的内容为洮南县、齐齐哈尔等地区的运输、运输车辆、家畜饲养状况及交易情况（含定期集市）、牛、马饲养及死亡率、农具、耕作方法、土地地租、产量、地价、森林分布、森林种类、伐木及交易价格、木材运费及加工业、布匹销售及生产、香皂及钟表等日用品的销售、火柴及酒类销售路径、动物皮毛加工、流通渠道、上述各地农产品定期集市、中医药药材种植及销售、金融机构、通用货币种类、上述地区的驻军及治安状况、蒙古各地旗的人数、官吏及喇嘛庙状况等。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六册（13）由上、下两编组成，调查人

为古曳好，调查地点为“旧海龙府下辖的西丰、西安(现吉林省辽源)、东丰、海龙(现吉林省梅河口地区)、辉南及柳河 6 县”(14)。该书内文中没有注明调查期间，但依印刷日期及该书刊行顺序推测，其调查的期间应该在 1916 年春夏之间所进行的调查。依据内文，该项调查分为一般调查和县别调查。其中，一般调查项目中，主要调查对象为上述地区的各种税收种类及税金征收标准及土地、农产品交易习惯。县别调查中，依西丰县、西安县、东丰县、海龙县、辉南县、柳河县的县别顺序，分别调查了上述 6 县的人口、自然地理、主要集镇、县衙军备宗教、农业畜牧(主要为养蚕业)、商店、交易货物种类及交易价格、传统工商业种类、数量、道理里程、运输工具、通用货币、主要金融机构、度量衡、居民日程用品的购买及地方官吏绅士名录等。该项调查有别于其他都督府民政部调查人员所进行的经济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上述地区的物产和交通及运输车辆，用该书内文中的话说就是为了“开海铁路预定线路及附近地区”所进行的调查，可以说是为日本计划铺设的开海铁路所进行的事前经济调查(15)。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七册全书由 191 页组成(16)，封面小标题为“吉林省中部地方现势概要”。依调查复命书内文，调查员山科启吉所调查的地区中除吉林、德惠市等地为现在吉林省下辖外，阿城、五常、舒兰等地当属现在的黑龙江省下辖地区。另外，按照该丛书的刊行惯例，其调查员结束调查后会马上提交调查报告书，其后接到调查员调查复命书的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会在第二个月委托“满洲日日新闻社”印刷刊行。而山科启吉在 1916 年 10 月结束调查，上呈调查复命书后，因该报告书中“所载条项悉数得不到民政部的认可”(17)而没有刊行，直到第二年 4 月才“依原文”交由大连的“满洲日日新闻社”刊行。其中原委由于缺乏文献史料佐证，尚不得其详。

从调查复命书的内文看，山科启吉此次的调查起点为长春，经农安、德惠、榆树后右折北上，经五常堡、阴背河、拉林抵达阿城，其后，原路返回榆树后南下至秀水甸子，经舒兰、瓦缸、乌拉街、旧站抵达吉林省会吉林。山科启吉的此次调查涉及沿途地理、工商业、农业、矿业、金融、税捐等 6 项，调查内容包括沿途各县和集镇人口、地理、交通运输(含水运和陆路运输)、工商业中农产品、手工业品、外来工业品的交易种类、价格、商店、运输、定期集市，农业中农产品生产、土地及土地买卖、耕作方式、农人生活状况，舒兰地区煤产量、销售，上述地区通用货币、各种货币兑换比价、金融机构以及吉林省内各种矿税、田赋、契税、木材税、烧锅税、地方税等捐税种类、金额等。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第八册(18)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嘱托”大神正节于 1916 年 11 月至 1917 年 3 月间，对现内蒙古林西、经棚(19)地区所作的经济调查出差报告书。根据该书内文，此次调查项目主要分为林西和经棚两个地区。在林西的调查项目中，受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派遣的大神正节主要调查了林西地区的捐税、驻军、官衙及农业、金融、商业、交通运输、工业等五个项目，依次调查了税收种类、地价和地租、主要农作物、农具、肥料、货币种类、金融机构、商店经营品种、日本商品的销售情况、道路修筑、大车店数量、传统工业中的酒类、豆类生产及金银、铁器木器和皮革加工、砖瓦生产等情况。在对经棚地区的调查中，“嘱托”大神正节主要将该地区的调查分为了商业、工业、农业、金融货币及捐税、通信及交通机构等五大项。其中，在对经棚地区的商业调查中，受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派遣的大神正节主要调查了该地区的畜产品、动物皮毛、食用盐、药材等的交易集市(定期与非定期)、交易习惯、使用主要货币、价格、货源及销售数量；在对经棚地区的工业调查中，大神正节主要调查了该地区的造纸

业、金银铜铁(含农具、马蹄铁)器加工业、成衣鞋铺、木材加工铺、皮革毛毡、马鞍马具、钟表修理、面条(含豆素面)、饭店、大车店、染房、粮店等的数量、经营主及价格等情况;在有关该地区的农业调查中,大神正节主要调查了该地区的农作物种类、耕作习惯、土地关系、地价、农具使用、农业相关捐税、农作物价格、雇工工资及蔬菜种植和零售价格等情况;在有关金融和捐税中,大神正节主要调查了该地区的车马捐和货币种类及钱庄等情况。最后,大神正节还调查了该地区的电信、邮局、运输工具及道路的主要里程和修筑情况。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四册和第十册同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组织的对赤峰地区的经济调查复命书。按照《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第十册刊行说明,《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第十册刊系对该丛书第四册的增补(20)。但第十册,即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所“嘱托”的调查员三原作一对赤峰地区的增补调查,也为“以赤峰为中心所进行的调查,缺乏详细记述,其观察亦不得正鹄,姑且依所见原文刊行”(21)。由此可见,三浦稔和三原作一所进行的两次赤峰地区的经济调查均不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所认可。

从《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十册,三原作一所进行的对赤峰地区调查,三原作一对赤峰地区进行经济调查的时间为1916年9月至1917年3月,调查项目分为“赤峰县内一般状况”和“赤峰事情”两项。其中“赤峰县内一般状况”中所进行的调查有赤峰县的沿革、人口、自然地理、行政组织、宗教、农业及畜牧业和矿业等。在“赤峰事情”项目的调查中,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赤峰人口、主要资产家、税款用途、产品销路、运输机构、骆驼数量、通信机构、商业店铺、出资人、红利分配、中外商店明细、商会、交易习惯、购买力、主要农产品种类及销售、皮毛及药材价格。此外,该调查中着重调查了赤峰县内各集镇的传统手工业中烧酒、榨油、染房、制蜡生产销售及度量衡、货币(含各种货币兑换比价)、当铺等情况。另外在书附录中还统计和罗列了赤峰地区粮行、皮毛店、大车店、点心店、烧酒、染房、铁匠炉、木匠铺、盐店等各商店的店主、资本金、规模等情况。

我们仅从上述调查中可以发现,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在这一时期的调查地区主要集中在吉林地区中部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依现在东北行政管辖区域看,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调查区域为吉林省南部与辽宁接壤地区和辽吉黑三省西部地区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其调查的主要内容以上述地区的工农业物产、商业销售规模、货币交通等情况为主。其调查期间为1915年1月至1918年2月,调查时间跨度达3年之久。至于关东都督府民政部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对东北中部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长达近3年之久的调查,我们将会在本文的后部进行详述,简而言之,我们仅就上述的调查内容而言,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在这一时期中对上述地区的调查其表面上的经济动机非常明显,换而言之,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所派遣的调查人员中可能系人类文化学或民俗学的学者,但依上述所调查的内容而言,我们并不能由此断言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上述地区进行了所谓的民俗文化上的“旧惯”调查,当然更谈不上是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民族科学考察。

与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出差报告书刊行的同时,该府民政部还从1916年9月至1920年2月间陆续公开出版了系列的《满蒙经济事情》计24卷。该丛书收录了北至中俄边境的哈巴罗夫斯克南至大连地区,东至中朝边境城市西至内蒙古东部等地区的松花江水运、土地贸易、各地商情、货币银行、蒙古土盐、地租、果园种植、羊毛销售、日本商人、东北小麦生产及价格、东北牛骨加工、东北小麦粉大豆出口种植及出口加工、东三省政情及税收、大连港进出口、四平柳河赤

峰等地商情、货币种类及兑换率、东北农家农具、雇工工资等各种调查报告。这些调查中既有受该府民政部派遣出差各地后所撰写的各种调查报告,也有一些民间商人、学者和浪人等自由撰写的东北各地调查和考察报告。这些报告虽然不像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派员调查那样系统和全面,但这些刊行报告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急于调查和了解东北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贸易和商业信息的迫切程度。

二

在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的同时,该府所辖的陆军部也对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各种调查。

如前所述,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与该府民政部同时期设立,但由于陆军部不为日本内阁所辖,故此陆军部组织条例为日本陆军大臣以敕令第 204 号形式单独发布。按照其初期公布的《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条例》相关规定,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为“关东都督所辖”,下辖参谋部、副官部、法官部、经理部、军医部和兽医部(22)。其中,经理部原为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内各师团的驻军军费开支收领及编制军部预决算的单位,但从该府陆军部刊行的有关东北调查报告及兵志中,该府经理部还负责对东北兵志地理的收集、调查工作。

从我们目前收集到的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刊行相关东北调查文献中看到,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初期对东北及蒙古东部地区的主要调查成果有《满洲志草稿》、《东部蒙古志草稿》、《东部蒙古志补修草稿》及《满洲产业志》四部大型出版物。其中,《东部蒙古志草稿》刊行于 1908 年 3 月。该书由 3 卷编成,可谓是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第一部关于“满蒙调查”成果。依该书内文,作为“满蒙诸物资调查中的一部分的蒙古东部调查”,最早“始于 1906 年,完成于 1908 年”,“因无实地调查之经验,其间遭遇诸多预想外之不便及艰难,然幸未中断”(23)。其系列调查中,其调查范围主要以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为中心,北部延伸至蒙古土谢图汗部及南部察哈尔八旗、热河都统所部及锡呼图库伦喇嘛旗等地,调查项目分为移民、土地开垦、宗教与教育、蒙古族风俗(含衣食住行、婚殇嫁娶等)、产业、与清俄贸易、道路交通状况、人口及都镇城市等。

虽然该书自刊印以来,受到日本军方好评被认为是迄今为止首部关于蒙古兵志的全书,但也有人指出了该书所存在的缺陷,提出了该书“至详细之处甚详,而疏漏之处亦甚多”,且“文体叙辞不一”,“存难解之疑问”(24)。为此,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经过几年的细致实地调查,修订并增补了东部蒙古志,并于 1914 年刊印了《东部蒙古志补修草稿》。通过两部新旧蒙古志对比我们发现,《东部蒙古志补修稿》在原有《东部蒙古志》的体例基础上,主要对毗邻东北西部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等四盟部分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调查和记述。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所对东北蒙古地区调查期间适逢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的成立,为此,该书中新增添了“辛亥革命后”、“共和国政府的蒙古统治”、“俄蒙关系”及“中央行政机构的蒙藏事务局”等项目,对辛亥革命后,蒙古东部地区政情和对外关系进行了添加。

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所进行的对蒙古东部调查中,对于所从事调查的人员及调查活动一直不知其详。依内文前后的说明,我们依稀可以了得到,上述对蒙古东部的调查中旭主计、藤田及米田等人被屡次提及。通过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同时期刊行的职员录比对,我们推测,文中的旭主计应该为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经理部的部员陆军一等主计旭藤市郎,而文中屡次提及的米田应该为同部部员陆军二等主计米田宽(25)。这样,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满蒙”调查与民政部的调查存在

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政部的“满蒙”调查，主要是专门聘用了部外人员，作为“嘱托”从事调查，而陆军部则以部内的高级军官官僚为调查的主体。关于调查情形，我们依据两部新旧蒙古志，目前所能够了解到的就是，上述接受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派遣的调查人员先行取道北京，访问滞留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和官吏，并取得内地旅行许可后，以私人旅行的身份自张家口进入内蒙古境内进行调查。

此外，关东都督府陆军部还在《东部蒙古志》刊印后，公开出版了《东蒙古》。该书被学术界认为是《东部蒙古志》的简约版，于 1915 年由东京官本武林堂出版发行。

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有关《满洲志草稿》的调查和刊印晚于《东部蒙古志》。其中原因可能是由于有关东北的地志早在 1889 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就已经根据我国早先刊行的东北文献资料编印了《满洲地志》列入了《支那地志》系列丛书中。其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为战争所需，于 1894 年刊印了新版的《满洲地志》单行本。这样，与蒙古东部相比较，东北兵备所需的地志就显得不那样急迫。尽管如此，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经理部在 1906 年成立后不久就组织了以首任经理部部长村楠造为首的东北地志调查班，进行《满洲地志》的文献调查工作。其后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经理部陆军一等主计旭藤市郎、同部陆军二等主计米田宽，及“山田(26)、平手、中村、铃木、藤田、南云、安腾”等主计及“市川、西山等嘱托员”和“望月、白石、中村、织田、桥口”等雇员(27)先后组成调查班，于 1908 年至 1911 年间分别对东北各地进行了综合性调查。在此基础上，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于 1910 年 1 月开始着手进行满洲地志的编撰工作，同年 9 月，《满洲志草稿》脱稿于第二年 8 月刊印首批《满洲志草稿》，并分发给陆军各个单位。

《满洲志草稿》虽然名为草稿，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但长期以来成为日军学习和研究东北地区兵志的必读书。经过其后的几次修订，最终《满洲志草稿》全书由三辑 18 卷编成。其中第一辑由 4 卷组成的一般志；第二辑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地方志(28)，合计 7 卷，第三辑为东北周边接壤地区的地方志和附录。其中，周边接壤地区地方志为 3 卷，附录由《关东州地方志》、《物资统计图表》、《道路志草稿》和《关东州志补修草稿》等 4 卷组成。

在《满洲志草稿》内部刊印后的不久的 1916 年，日本东京的民友社还公开发行了由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组织编写的《满洲产业志》。该书由于是公开发行，故此在日本国内的北海道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及东洋文库等图书馆均有收藏。该书分为 3 卷，合计 733 余页，并附有各种相关统计表和简图。有关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对东北产业的实地调查，由于文献上的匮乏，不知其详。从目前所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上看，我们目前只查阅到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以“成田少佐调查”名义撰写的《东蒙农业》的小册子。该调查报告没有出版社，全文只有 58 页，可能也为内部刊印的出差报告书(29)。

三

实际上，日本关东都督府设立以来，其下辖的民政部和陆军部及后来官制改革后成立的关东厅及关东军司令部对东北及东北周边的内蒙古东部地区、西伯利亚及朝鲜地区均进行了各种方式的调查，并刊行和编辑了各种公开的和内部的调查报告书和刊行物。故此，其调查情况远不止前述的几项调查。像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及改组后成立的关东厅，对东北地区的调查中还有对东北地区各种矿业、盐业、葡萄、渔业、皮革、鸦片、法规、教育、水力资源、货币金融、对外贸易、土地关系、风俗人情以及东北地区军政、人物动向等均进行了各种方式的调查，

并形成了各种调查报告。其中，桥本益太郎等人撰写的《满洲皮革工业调查报告》（1917 年刊行）以及《南满洲矿产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东部内蒙古矿产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满洲产业调查资料》丛书以及《满洲期粮和银市》等就属于这些调查后刊行的调查报告。关东厅成立后，其下辖的内务局、警务局等机构除去对辽东半岛内的各种细致调查外，对东北其他地区的调查报告还包括《满洲水利水源调查资料》（关东厅内务局土木课）系列丛书、《南满洲的神社与宗教》（关东厅内务局学务课，1915 年刊行）、《东北四省行政组织一览表》（关东厅财务部财务课，1931 年）等。关东厅警务局对东北的调查主要关注东北政局及延吉等地区的治安状况。其中像 1928 年 6 月“皇姑屯事件”中，关东厅警务局就向日本内阁上呈了警务局根据自己的调查系统调查的有关张作霖被炸情况报告（30）。

从总体上看，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及其后的关东厅对东北所进行的调查特征明显。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偏重对东北各地的产业调查。尤其是对辽东半岛租借地周边地区及东北中部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调查比较多。而相对于“满铁”、关东军司令部和各地日本领事馆的调查而言，第二个特征就是对东北政情和地方志类的调查比较少。第三就是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地区调查范围比较有规律。我们按照其刊行的调查报告时期上看，其调查基本上是先进行辽东半岛租借地内的调查，然后是毗邻辽东半岛租借地的当时奉天省内的调查，其后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调查重点迅速转移至当时奉天省北部地区的吉林地区和奉吉两省西部的内蒙古东部地区。

相对于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及其后的关东厅偏重东北地区的产业调查特征，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及其后的关东军司令部的调查则偏重于对东北军事、政治及军事战略意义上的产业调查，其调查特征也非常明显。其中像前述的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所作的东部内蒙古、东北地志及东北产业调查，及该部所属儿玉秀一郎的《赵将军的财政政策与奉天恐慌》（1907 年刊行）、《军事上观察之满蒙一般状态图表》（1914 年刊行）等均属于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对东北地区的调查。

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对东北所进行的各种调查，其目的不言自明，就其目的和背景而言，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地区的调查背后也有其不同的目的和背景。

首先关东都督府在设立之初就有台湾总督府的官僚大量调入。关东都督府设立之初，因身兼台湾总督府总督的“满洲军司令部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之故，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被聘为新设立的“满铁”公司首任总裁。在此前后，随后藤新平的到任，后藤新平带来了自己的亲信中村是公、石塚英藏、相贺照乡、杉浦俭一、岛村幡彦、浦太郎、栗原贞吉、村上庸吉、入泽重磨、田中刚辅、山路魁太郎等 30 余名台湾总督府的高级官僚分别出任初期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民政长官、警视总长、庶务课长、大连民政署署长等职。上述这些台湾总督府的高级官僚不仅是后藤新平的亲信，也是在台湾以从事台湾土地、旧惯、原住民、鸦片专卖等各种调查而升迁的高级官僚。这样，这些台湾总督府“调查员”出身的高级官僚的到任对于关东都督府在设立后不久就开始对辽东半岛租借地内及毗邻的奉天省进行各种调查不能说在一定意义上颇具影响。

其二，关东都督府在设立之初，辽东半岛地区人口稀少，产业基础薄弱，其税收收入不足以填补和维持骤然庞大起来的关东都督府的财政预算，这样，关东都督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中不得不依靠日本本土的中央财政补助金来维系其年度的预算平衡。为扭转这种依靠中央财政补助金来维持关东都督府运营的局面，关东都督府采取了鸦片专卖及通过土地调查整理地税收收入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大连港及满铁铁路线等辽东半岛所处的货物运输等独特的地理条件来提高年度财政

收入,关东都督府初期进行的租借地内及毗邻租借地的各种产业调查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目的来进行的。另外,在关东都督府设立初期,日本当局调任了后藤新平等大批台湾总督府官僚来关东都督府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考量。1895 年日本窃据台湾,设立台湾总督府后也面临了同样的财政困境,以至于当时的日本当局内部出现了为减少财政重负,转手台湾的议论。而后藤新平等人到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局长(其后台湾总督府官制改革,改称民政长官)后,通过鸦片专卖、土地旧惯调查来整理财政,才使得台湾总督府逐渐摆脱了日本中央政府巨额的财政补助金的困境。

与第二点相关联,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欧美等国混战之际,依靠造船业和运输贸易大发战争财,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蓄积了大量资本。为此,日本趁欧美等国无暇东顾之机,利用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加大了对中国各地的军事和经济控制。其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二十一条”交涉企图控制袁世凯政权外,进行资本投资占领中国各地市场也是其经济控制的目标之一。关东都督府在 1915 年至 1918 年间集中对东北中部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所进行的各种大规模经济和产业调查可能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进行的。在关东都督府的上述大规模调查后关东厅所组织的“满洲经济调查会”进行的前后六次大规模对东北各地金融、银行、水产、工商业、交通、产业发展对策等的调查(31)也是属于在上述背景下而展开的。

其四,关东都督府作为日本政府的海外殖民机构之一,也作为执行日本政府国策的执行机构之一,同样也肩负着在“满蒙”地区内进行各种势力渗透的“重任”。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地区及周边的各种调查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其中,像其后的关东厅警务局对张作霖、张学良等东北政要人物的动向调查,对黑龙江省、吉林省及奉天省各地军政人物的家庭、资产、学历、经历调查及对东北军事的调查,更明显地体现了这一背景下关东都督府进行的调查背景和原因。

关东都督府作为日本政府在海外殖民地的机构之一,同“满铁”、关东军司令部及领事馆对东北进行的各种调查中,既有其机构性质上的角度分工,也有共同合作上的调查。其中像关于东北地志的调查中,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在前期的东北产业调查就采用了该府民政部的调查。另外在东北经济产业调查中,“满铁”调查部、日本领事馆的领事报告以及关东军司令部所进行的调查中均有相当部分重合和相同领域的调查,但是从总体上看,上述四个机构的调查均有着各自的专业角度和使用目的。其中像“满铁”调查部的调查更多为满铁沿线的产业调查,其目的在于使得“满铁”在货运方面的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而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及后来的关东军司令部所进行的东北产业调查更多的是在于从军事战略角度上调查东北地区的交通、水流、气象及可供军事用途的军事战略物资方面的调查;而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的领事馆所形成的定期的各地“领事报告书”(32),则从日本商人更能够及时获取东北各地产业进出口数量、价格、运费等,以利日本企业和商人进出东北,为日本企业和资本提供东北经济信息平台的目的考虑。

虽然上述在东北的日本四个机构有着不同的角度和目的对东北进行的调查中,既有相当的重复,又有各自的调查报告,但正是这些对东北的不同调查才构成了日本对东北的综合的整体性的调查。这些调查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日本对东北进行各种经济、军事和政治外交上势力渗透的需要,也为后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在事变后迅速扶植亲日势力建立傀儡政权,进行了长达 14 年的殖民统治提供了关键性的基础。借用一位我国东北史研究者的话说,日本对东北的

调查就宛如手术台上的放大镜，小到童谣、儿歌、车店招牌，大到山川，均有详细调查和记录，以至于我们今天研究近代东北都不得不参阅当时日本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出差报告书和调查文献。

固然关东都督府对东北的各种调查数量和规模远不及“满铁”调查部所进行的调查规模，但是我们从关东都督府对东北的调查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带有现实性的启示和借鉴。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企业和机构进行发展乃至走出国门之前，都需要这种对投资地区的各种经济产业、地区民情、当地政策法规、政情、金融环境、当地工资水平、物价、气候条件、道路水网和交通等进行详细的多方面的考察和调查，才能使得我们的企业和机构迅速占领战略高地，以确保企业和机构能够在当地取得长期的发展。

注释：

①关东都督府因其后的机构改组，其名称上经历了三次变化，本文为研究叙述上的方便，统称为“关东都督府”。

②就日本国内学术界研究而言，有关关东都督府东北调查的研究也不多。其中主要研究论著有吉田顺一《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对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书》（载于《日本蒙古学会纪要》1998年第29号）、江夏由树《关东都督府及关东厅的土地调查事业研究》（载于《一桥论丛》1987年第97号）等。

③按照《关东都督府官制》规定，关东都督府下还设有都督府官房秘书课、文书课和外事课。另外，1919年经过关东都督府官制改革，由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改组设立的关东厅所属机构均有变动。其中，关东厅下辖的机构有警务局、土木局、文教局等。

④上述调查报告书大部分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一部引自日本旧书网中所载书志信息。其中，《满洲柞蚕》为私藏本，2011年2月13日购于日本东京神田町一旧书店。该书水浸、虫蚀及缺页严重，无版权页，封面上仅能依稀辨得“大正6年、满洲□□柞蚕、□□□□政部庶务课”等字样，扉页上部有“东□□社情报室”图书藏书章，下部印有“关东都督府寄赠”字样。通过相关书志查阅，该册子可能与东洋文库所藏的《满洲柞蚕》为同一书籍。

⑤《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所刊行的数字结果系我们目前从日本全国图书电子检索系统中查阅和调查的结果，不一定是该丛书全部的刊行册数。

⑥《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一)》，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

⑦“嘱托”为日本各种机构聘用的有一定资历，且在一定期间内专门从事调查或研究工作的人员。“嘱托”在工作期间，享有薪水和各种工作补贴，但不属于聘用单位的员工，一旦指定的工作结束或聘用期满，即行解职。

⑧北村吉藏后来改姓宫崎吉藏。

⑨现称之为内蒙古通辽市，以下同。

⑩依所附之调查路线图，应为“开鲁县”。

(11)《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二)》现藏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

(12)《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三)》现藏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

(13)《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三)》现藏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另根据其扉页，该书刊行于1916年9月10日，为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印刷。

(14)引自该书扉页部。另外上述地区当时为奉天省辖内，现为吉林省管辖。

(15)开海铁路、四洮铁路等为日本在攫取南满铁路支线后，为保证南满铁路货物运输对东北地区的垄断的而计划修筑的四条支线铁路线，为此，日本将上述铁路线的修筑案同东北历届当局提出交涉，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所谓的满蒙铁路交涉悬案。

- (16) 现藏于神户大学社会学部图书馆。
- (17) 引自《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七)(吉林省中部地方现势概要)》扉页。
- (18)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八)》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
- (19) 现为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地区，以下同。
- (20)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第四册刊行于 1916 年 8 月，调查员及调查日期详见表 1。
- (21) 引自神户大学社会学部图书馆藏《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第十)(赤峰事情)》，扉页。
- (22) 1906 年 7 月 31 日敕令第 204 号《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条例》。《官报》第 6927 号，1906 年 8 月 1 日，第 6 版。
- (23) 引自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东部蒙古志》(下)，1908 年 3 月(大空社，2006 年复刻版)，附录第 2 页。
- (24) 引自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东部蒙古志》(上)，1908 年 3 月(大空社，2006 年复刻版)，第 5 页。
- (25) 参见《旧植民地人事总览(关东州篇)》，日本图书中心，1997 年复刻版，1908 年至 1910 年度部分。
- (26) 即山田久太郎。山田久太郎为日本富山县东砺波郡人。日俄战后随军来到大连，先后参加了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经理部的“满蒙”地志及经济调查。其后，辞去陆军部主计职务后，滞留大连从事东北地区城市和乡村调查及交通商业调查研究，先后执笔和出版了《满蒙都邑全志》等书。后迁回日本本土就职于北日本新闻社，先后担任记者、编辑、主编及社长等职务。
- (27) 《满洲志草稿》(第一辑)，kuresu 出版社，2001 年复刻版，第 1-2 页。
- (28) 其中第 1 卷至第 4 卷为奉天省志，第 5 卷至第 6 卷为吉林省志，第 7 卷为黑龙江省志。
- (29) 该调查报告现收藏于日本小樽商科大学、农林水产省和京都大学农学部图书馆(引自日本亚洲研究所编《旧殖民地关系机关刊行物综合目录》，第 115 页)。
- (30) 有关关东厅警务局上呈给日本内阁的张作霖被炸情况报告请参阅拙稿《日本媒体中的皇姑屯事件》(收录于郭俊胜主编的《张作霖与日本关系》、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52 页—263 页)。
- (31) “满洲经济调查会”设立于 1922 年 11 月，1932 年 7 月解散。期间进行了 6 次大规模调查。其中，第 1 次调查时间为同年 12 月，调查内容为“满洲产业开发方案和政策”。第 2 次调查时间为 1925 年 6 月，调查内容为“关东州水产振兴问题”、“关东州生产物品进口税问题”；第 3 次调查时间为 1926 年 6 月，调查内容为“满洲今后十年应实施之重要产业计划”；第 4 次调查时间为 1928 年 8 月，调查内容为“日满贸易振兴方案及政策”、“在满洲日本工商业者的银行贷款利用状况”；第 5 次调查时间为 1930 年 12 月，调查内容为“在满洲中小工商业振兴方案及政策”；第 6 次调查时间为 1932 年 5 月，调查内容为“满蒙产业开发贸易发展方针及政策”等。
- (32) 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的领事馆所报告的领事报告中，关于东北各地经济及产业贸易情况部分以《满洲事情》的形式进行了刊印，并公开发行。[^]

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13 年 1 期

滿鐵與撫順早期殖民化城市

辽宁省抚顺市博物馆 金辉

摘要 九一八事变后，抚顺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抚顺大肆开矿设厂，疯狂掠夺资源。抚顺以畸形的殖民化城市发展起来，成为日本掠夺资源，屠杀与奴役中国人民的缩影。

关键词 满铁抚顺炭矿早期殖民化城市

抚顺早期殖民化城市的兴起，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和侵略历史的缩影，是令抚顺人民没齿难忘的一段噩梦般的经历。本文试就满铁抚顺炭矿的开发与抚顺早期殖民地城市的兴起历史作一概略回顾介绍，管窥抚顺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以警醒世人勿忘国耻，奋发图强，为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而努力奋斗。

一、日俄战争与抚顺炭矿的设立

1901年民族商人王承尧同满人绅商荣伦、英凯等人愿出报效充向银一万两向奉天将军增祺申请开采抚顺煤炭。稍后抚顺地方乡绅翁寿及颜之乐等人也以充响白银一万两为报效银向增祺申请开矿。当年9月，清政府批准了增祺关于开办抚顺煤田的奏章。于是，王承尧集资成立“抚顺华兴利煤矿总公司”开始在千山台山北麓开掘矿坑进行采煤。同年翁寿的“抚顺煤矿总公司”也挂牌成立并在王承尧矿坑的东边开始采煤。1904年2月9、10日，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利益，俄日双方分别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1905年3月9日，日本鸭绿江军在追击俄军中进驻千金寨，占领了包括王承尧华兴利煤矿总公司在内的抚顺矿区，竟然以主人的身份着手整顿矿山生产。1909年9月4日，中日两国签订了《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其中第三款规定，以纳税为条件，清政府承认了日本对抚顺、烟台（在今辽阳灯塔市）两煤矿的开采权。1911年5月12日，中日双方又签订了《抚顺、烟台煤矿细则》，抚顺、烟台煤矿被日本人以“合法”的手段霸占开采。

1905年5月1日，日军在抚顺成立“抚顺采炭所”，同年9月11日，成立抚川矿“第一采炭所”取代“抚顺采炭所”，日人利用中国人开凿的旧坑采煤最高日产曾达一千四百多吨。1907年4月1日，抚顺“第一采炭班”改属新成立的满铁，称为“满铁抚顺炭坑”。1918年，抚顺炭坑改称“满铁抚顺炭矿”，满铁以抚顺炭矿为中心通过购买、强占等手段不断扩大所谓“满铁附属地”，使之达到68397平方千米，成为整个日本满铁附属地中面积最大的一块附属地。抚顺炭矿自日本人开采到1945年东北光复，产煤总量近两亿吨，获取利润二十多亿日元，抚顺煤矿在满铁的全部营业收入中是仅次于铁路的第二大财源。

二、抚顺早期殖民化城市的出现与发展

1. 千金寨时期的“新市街”

抚顺的近代采煤业是在抚顺千金寨、杨柏堡和老虎台地方开始起步的。1907年，满铁经营千金寨矿坑后，从日本国内抽调大批采煤技术人员携妻带子来到这里各种投机者、艺妓、浪人、冒险家、商人也接踵而至，到1907年，来千金寨的日本居民已达825户5669人。

在此形势下，满铁于1908年5月，同采矿用地一起，在千山台北面山脚收买了近百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炭坑附属事业和市街用地，开始在千金寨西边约三千米的地方建起了一个新市街——“日人街”。

“日人街”以抚顺第一个火车站——千金寨站为中心，从南向北修建了七条东西横向的马路，依次称一条通到七条通，南北纵向街路从东向西依次有富士町、朝日町等，马路宽敞整齐，两侧洋楼建筑式样别致新颖。整个市街的东半部有日本警察署、守备队、修武馆、俱乐部、图书馆、邮电局、学校、医院、商店、神社、自来水厂、电灯厂、炭坑中央事务所、炭坑职员住宅、大型公园等，住宅内暖气、煤气、上下水、电灯电话，应有尽有。

相对于千金寨日人街，千金寨中国人聚居的“新市街”也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发展起来。随着炭矿生产的扩大，移居千金寨的人口愈来愈多，总人口达到六七万人之多，千金寨已成为抚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东北地区小有名气的繁华市镇。

随着千金寨“日人街”和“新市街”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商饮服务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大小门市、手工作坊布满街头，工商企业1182户，千金寨发展成为辽东地区一个商业重镇。

千金寨中国人居住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商业的设立，规模不断扩展，但因无统一规划，房屋建筑参差不齐，构筑简陋，街道弯曲，宽窄不一。矿工们居住的房舍，低矮潮湿，环境恶劣。

2. 抚顺新市街的规划建设

正当千金寨不断扩大发展之时，日本的地质勘探表明，千金寨新旧市街下贮藏着巨大的特厚煤层，要想开采这些煤炭，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起来的新市街及在此居住的日本人必须和中国街里的居民一样需通通搬迁到别处。

1918年，日本人选定与抚顺城隔河相对的永安台地区开始建设供日本人自己居住的社宅区，在永安台山岗西侧的平地着手建设抚顺商业区，在商业区西边建“支那矿工大游乐园”。即“欢乐园”，这些统称为抚顺新市街。为解决千金寨中国居民动迁问题，又在千金寨北侧紧靠浑河南岸一块洼地，造出一块面积约一百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千金寨中国居民的转迁用地——“新抚顺”。由此，形成了抚顺现代城市中心。在中心区以外，围绕着各个采炭所，又修建了南花园、杨柏堡、老虎台、万达屋、新屯、龙凤等地“日人街”。以上这些，奠定了抚顺早期殖民化城市中心区和附属街区的基本格局。

日本人把新市街称为“永安台地区”，亦即今天的新抚区南北台、抚顺站前等地区。新市街商业区的规划首先确定了铁路抚顺站的位置，并以广场为中心，向南设一条主干线，称中央大街(中央通)，以此中轴线两侧对称各设一条主干斜路，西斜路为千金大街(今解放路)，东斜路为永安大街(今民主路)。站前东西马路，依次横向排列十条市街道。中央大街以东，东一条通至五条通为日本商业区；东六条通至八条通，为日人文化教育中心，设有邮电局、学校、日本寺院等，中央大街以西，有市公署、警务处，以及大小商店等。

在站前商业区以东的丘陵，即称为永安台的山岗上，建有成片专供日本人居住的西式洋楼，同时，以永安台为中心，在东侧建了东公园(今劳动公园)、北侧修建了西公园(今儿童公园)等，还修建了露天游泳场和室内游泳馆。

从1925年4月开始，抚顺炭矿又在新市街商业区西侧，建设“支那矿工大游乐园”。这里除原有的“老君庙露天戏台”和“共乐舞台”外，又新建了许多妓院、戏园子、酒馆等场所，各种货商店铺也鳞次栉比，应有尽有。在欢乐园林立的商号中，一些大烟馆，如“永藏楼”、“同乐楼”、“广发成”等较为有名，同时还有许多赌场也夹杂其中，而妓院更是这里的一大特色产业。

随着新市街的建设，主要为日本人使用的城市基础设施也相应建立。1908年4月“抚顺炭坑工务事务所水道泵”，在市中心的永安桥南头西侧建立水源地，日供水800吨，到1920年，又相继新建两处水源地，供给市民生活用水增加到6860户，达四万余人，这些用户大部分是日本人 and 少数有权势的中国人。1909年，继上海、大连之后，抚顺成为中国第三个使用煤气的城市。到1945年，煤气用户达五千余户。1908年，为解决采煤动力需要，满铁在大山坑建成坑口电站——第一

发电所；1914年在大官屯开始兴建门特瓦斯发电所；1920年，着手兴建大官屯第一发电所；1930年，又开始兴建大官屯第二发电所。到1943年，大官屯发电所改称“抚顺发电所”，总容量达29万千瓦，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发电厂。

抚顺地区铁路包括电气化铁路建设也起步很早。1904年，沙俄在抚顺修建第一条铁路。1905年，日本将沙俄所修铁路改建成苏(家屯)抚(顺)线，当年8月1日，在永安台东山脚下，建成一处车站，定名为抚顺站，只办理货运。同年10月，又在千金寨建成千金寨站，只办理客运。1913年千金寨火车站改称“抚顺站”，千金寨的抚顺站成为当时与大连、旅顺、奉天(沈阳)、长春火车站比肩的满铁五大停车场之一。1923年随着千金寨动迁，满铁在现今抚顺站址修建火车站，1924年末开始办理客货运输业务，车站仍定名为抚顺站。

1906年3月5日，中国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8年后，抚顺炭坑于1914年完成了区内电车线路的改造，实现铁路电气化。到1940年3月，线路延长达188.729千米，全矿区拥有电动客车四十余辆。

抚顺的汽车客运相对于铁路起步稍晚。1923年7月，日本人在抚顺开设“山口出租汽车行”，到1945年光复前，有多条线路在市区运行。抚顺长途汽车客运始于1926年，这一年8月，商人张国纪等十余人集资购车10辆，创办“抚兴长途汽车公司”，其后有中国商人和日本人，分建了几个长途汽车公司，经营抚顺至沈阳、兴京(新宾)、铁岭、本溪等线路。但规模都不是很大。

顺抚顺早期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全是满铁依托抚顺炭矿生产而渐次推进城市建设与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在城市建设中，都是在日人优先的原则下进行，中国人(当时称“满人”)的居住区，基础设施无法和日人居住区相比。以安置千金寨动迁居民的“新抚顺”为例，居住区内房屋拥挤，道路狭窄，居住区成天笼罩在灰尘和烟雾之中，环境十分恶劣。

综观日本占领时期的捌唉，其城市化过程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抚顺资源的强盗式掠夺和殖民统治而不断发展起来的。日本人在抚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其以为能够永久殖民东北包括抚顺的美梦下完成的，但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彻底击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美梦，抚顺城市获得了新生。

参考文献:

1. 抚顺矿务局煤炭志编纂委员会抚顺矿区志 1999
2. 杜景琴抚顺县志 1995
3. 抚顺市商业局商业志编纂办公室抚顺市商业志(1840-1985) 1993
4.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东北沦陷十四年吉林编写组满洲国史·分论 1990
5. 马玉春;孙文卿抚顺发电厂志 1989
6. 抚顺市地方志办公室抚顺市志 1993
7. 姚方鹏抚顺永安里——妓女院
8. 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 1991
9. 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 1988
10. 满史会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 1987
11. 苏崇民满铁史 1990

原文出处：兰台世界 2013(34) 12月上旬

大連老建築漫話系列（一）

——團結街、勝利橋

許勇

每每提到老北京、老上海、老天津時，老者多順口稱之為北平城、上海灘、天津衛。老大連人通常稱老大連為大連街。

如同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天津的濱江道一樣，大連也有條盡人皆知的街道，它就是今天團結街，亦稱俄羅斯風情一條街。這條被譽為“大連之城市原點”的街道及其比鄰的勝利橋，幾乎與這座城市同齡，它們共同見證並親歷了許多歷史的瞬間。

1901年，八國聯軍之一的俄軍搶占了旅順和大連，在俄國殖民者所作的“達里尼港規劃圖”可以看到，大連的第一條街名字叫做“工程師大街”。當時，俄國人將大連的街道分為五類，即廣場、大街、林蔭街、街和巷。

從遺存的老照片和明信片等史料不難判斷，俄國人修建這條大街還是相當用心和賣力的。難怪身臨其境的日本文豪夏目漱石驚嘆道：“當我們一行人到達下榻的日本橋（即勝利橋）大和旅館時，遠遠看見那些由露西亞人（指俄國人）設計建造的三角屋頂的各式洋樓，不禁感嘆日本橋雖名為日本橋，實為西洋風景之所在。曾在內地聽參戰兵士說，攻占達里尼時，對露國（沙皇俄國）經營的達里尼街區很是驚嘆，其面貌連東京最繁華的銀座也無法比擬。”

日俄戰爭後，日本取代俄國侵占大連。日本人按照自己的政治需求和文化習俗，立即著手更換帶有沙俄色彩的各類稱謂，包括城市街區的名字。大連的街道，首先以日本皇室、貴族、將領和政客，其次是以日俄戰爭中表現英勇的日本海軍戰艦，最後是以日本的都、府、县的姓氏或名字命名。

1907年11月，“工程師大街”（亦稱技師大街）改稱“兒玉町”，兒玉是指兒玉源太郎。兒玉源太郎，日本陸軍大將，被譽為明治時期第一智將，與桂太郎和川上操六並稱明治陸軍三傑。曾任陸軍大臣、內務大臣、台灣總督、滿洲軍總參謀長、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設立委員長等職。日俄戰爭期間，在203高地爭奪戰中，兒玉源太郎替代乃木希典大將為戰場總指揮，最終將俄國人擊敗。

1999年，大連市政府投資1.2億元，以達里尼市政廳舊址為中心，對周邊建築進行修繕和重建，並把這裡命名為“俄羅斯風情街”。老街現在的名字叫團結街，當地人還習慣稱作“勝利橋北”。

1899年，俄國人在大連青泥洼建行政市街時，由北向南延伸要跨過一條深溝，那條深溝將要建鐵路線，於是他們就在深溝上架起了一座跨線俄式木橋。俄國人曾規劃將其擴建成一個54米寬的大橋，且橋的兩端設計成半圓形廣場，分別輻射兩邊道路。後來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敗北，這個夢想破碎。

日本人稱這座橋為“露西亞橋”，1908年，木橋被日本人改建成22米寬的鋼筋混凝土橋。新橋建成後，被命名為“日本橋”。日本橋不僅造的結實，且造的精美，它的橋基、橋柱、橋欄和橋頭一律用花崗岩砌築，上面還雕刻有文藝復興式花紋。正因如此，使得造橋費用昂貴，花了約15.7萬銀元。日本橋的設計者是崗村象雄，他原是東京市土木工程師。

1945年抗戰勝利後，日本橋改名為“勝利橋”，沿用至今。

當時大連最先進的交通工具——有軌電車就從“日本橋”上駛過。1909年，

大连成为继天津（1906 年）、上海（1908 年）之后，中国第三个拥有有轨电车的城市。

1909 年，曾有一位日本名人从这座桥上“走”过，但却不是活着经过的，他就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他亲自参与策划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中日甲午战争。1909 年 10 月 26 日，当他乘坐火车抵达哈尔滨车站后，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灵柩车通过日本桥时，关东都督府都督大岛义昌、满铁总裁中村是公都参加了送灵。

多年后，还有一位中国名人走过这座桥，是活着走过的，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那是 1932 年 3 月，溥仪第一次来大连，从大连站坐火车到长春去建立伪满洲国。1935 年他又从长春来大连，转乘轮船到日本拜会裕仁天皇。这是他第二次来大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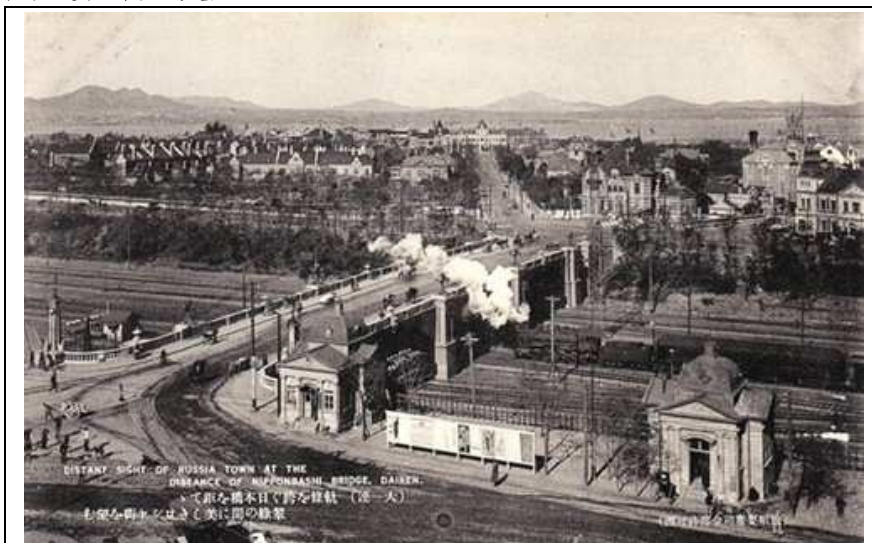
在俄罗斯风情街的尽头，有座老建筑虽已残旧，但它却很有故事。它就是昔日的达里尼市政厅，这座老楼始建于 1900 年，1902 年 5 月 30 日竣工启用，该楼为地上 2 层，地下 1 层的砖混结构，面积 4889 平方米，是一幢外观尽显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魅力，内饰充满巴洛克式艺术风格的大楼。

1904 年 5 月 28 日，日军占领达里尼港（今大连港），俄国人自知气数已尽，便开始炸毁或焚烧重要设备及建筑，达里尼市政厅侥幸未被彻底损毁。日本侵占大连后，于 1906 年对达里尼市政厅进行了修复，该建筑曾先后用作满铁的总部、大和宾馆分部以及满蒙资源馆，新中国成立后，它成了大连自然博物馆。

坐落于团结街 1 号的老建筑，始建于 1900 年，曾是沙俄达里尼市政厅的官邸，该楼面积 2500 平方米，属于近代俄罗斯建筑风格。自满铁设立，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就住此处。从他开始，这里就成了历任满铁总裁的官邸。

后藤新平的接任者是其嫡系中村是公，而中村有位挚友和同学，他就是近代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1909 年 9 月，夏目漱石应老同学中村是公之邀来到大连，顿时就被这座城市的漂亮建筑所吸引。据史料记载，夏目漱石当时就住在位于儿玉町（团结街）上那家大和旅馆。

从工程师大街、儿玉町，到团结街，从露西亚桥、日本桥，到胜利桥，大连，这座曾被俄日殖民统治的城市，从这条街发轫，从这座桥启程，走过其命运多舛的沧桑百年。今天的大连，早已旧貌换新颜，而那一座座老建筑，作为城市的活化石，将永远被载入史册。



日本占领时期的儿玉町全景



日本占领时期的达里尼市政厅



今日的团结街



昔日的日本桥



昔日的达里尼市政厅官邸



今日的大连船舶技术学校

参考文献:

- 1 品读大连之团结街：大连的城市起点
- 2 “大连第一街”当年赛过东京银座

日本満鉄會消息二則

(2014年11月11日)

1 満鉄会大会在名古屋召开

2014年10月25日，由东海満鉄之友会和近畿満鉄会联手主办的「満鉄会大会」在名古屋的新大饭店召开，満鉄会松岡理事長等40人与会。

松岡理事長在致辞中指出：“当下的年轻人，鲜有战争的知识与记忆，知道满洲及満鉄的更是凤毛麟角。对战争的痛苦与恐怖毫不知晓的日本人在增多，就亲身体验层面而言，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満鉄末任总裁山崎元干的外甥在发言中提到：“山崎元干的诞生地——福岡，自古就与大陆交流频繁，总裁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把满洲选作活跃之地”。

2 満鉄会信息中心藏书转让

満鉄会信息中心决定于2016年（平成28年）3月正式解散。

満鉄会收藏的多为购买及会员馈赠的图书，只有少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的一部分资料已转让给国会图书馆及亚洲经济研究所，剩余图书、资料的去处暂未决定。还有为数不少的美术明信片。剩余文献的收藏地将优先考虑那些可以公开图书的场所，例如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等。

藏书的名录将于明年春季在満鉄会主页上公布。有兴趣者请与常务理事天野先生联系。

日文原文：

■名古屋で満鉄会大会

10月25日に名古屋ニューグランドホテルで開催された東海満鉄友の会と近畿満鉄会共催の「満鉄会大会」は、松岡理事長以下40名が参加しました。

理事長は挨拶の中で、「最近の若者には戦争の知識や記憶がない人が多い。ましてや満洲や満鉄となると、ほとんどの若者が知らない。戦争の痛みや怖ろしさを知らない日本人が増えることは、自分の体験からいっても非常に恐ろしいことだ。そのような面を若い人に話すことは我々の務めだと考える」と話されました。

また、最後の満鉄総裁、山崎元幹氏の甥に当たる山崎又一氏は、山崎総裁が生まれた福岡県は、古来大陸との交流が多く、その血を引いた総裁は、満洲を活躍の地に選んだのだろうと話されました。

■満鉄会情報センターの蔵書の譲渡

満鉄会情報センターは、2016年（平成28年）3月に解散することが決定しています。

満鉄会には、一次資料は多くはありませんが、購入した図書や、会員から贈呈された図書などを数多く所蔵しています。一部の資料は国会図書館やアジア経済研究所に譲渡致しますが、残りの図書・資料の行き先は決まっておりません。絵はがきなども多数あります。譲渡先には、公共の図書館や、大学図書館など、図書を公開している機関を考えています。

蔵書名は、来春に当ホームページで公開する予定です。興味ある向きは専務理事・天野までご連絡ください。

资料来源：日本満鉄会网

许勇译

満鉄の夢

山田泉

私は今年85才の誕生日を迎える。

『御民(みたみ)われ生(い)けるしるしあり天地(あめつち)の栄ゆる時にあへらく思へば』の心境になっているこの頃である。

私個人の血縁により私が青春時代から今日に至るまで、中国大陸の極東に深い関係を持つてきたことを回想して、子や孫達に伝えていきたいと思ひ筆を執った。

私の妻の父関川平三は東京の帝国大学卒業後、当時日本における最大企業の満鉄(南満州鉄道株)の調査部に入社した。私の実母静江は関川家の本家の長女であるため、私は子供ながらも平三伯父の活躍をきいていた。私の妻澄子は平三伯父の末っ子の双児姉妹で兄と姉が上にいた。

この平三伯父の話に入る前に、私は関川家と満州にまつわるもう一人の悲劇の主に触れないではおられない。

第二次大戦の終末直前、突如ソ連が日ソ不可侵条約を破棄、満ソ国境を破って満州国へと侵攻し来り、在住の日本民間人(満州開拓移民もその大部分)を大量に殺戮し、男子を悉くシベリアに連行抑留した悲劇は周知の通りである。関川家の悲劇の主もその一人であった。

その人は、平三伯父のすぐ上の兄、関川徳治の次男関川信二、平三伯父の甥であったという訳である。

ソ連軍に抑留され、寒冷と飢餓と重労働により大勢の日本男子が広範囲なシベリア各地で命を失なつて行つた中で信二は生きながらえて帰国出来たが、既に家族六人は全滅していた。氏はその後再婚して新潟県庁出納長になつたが、一ツ橋大学時代運動選手で名を挙げた嘗ての面影はやつれ果て、体重も20貫から12貫に激減していて私も驚いたものだ。後日分厚い著作を出版して悲運を慨嘆した。

話は平三伯父の事に戻る。時代も大きく戻る。

平三伯父は後に満鉄から独立して中国山東半島の青島(チンタオ)市鉄山路(テツサンロ)に居を定め、周辺の撫順炭礦の無煙炭の露天掘りが大々的に施されているところで製塩業や金融業までも事業を拡大して資産を蓄積し、一族の兄弟姉妹は青島中学校、青島高等女学校を卒業した。

私の両親は平三伯父の招聘に応じ、結婚後3ヶ月、生まれて間もない私を連れて事業の手助けをしたが、私の進学のことも考えて間もなく帰国、私は新潟県の幼稚園に入った。戦後も青島市に縁のあるグループは幾度も氷川丸その他の汽船で往来したが、思い出を大切にするため敢えて航空機を用いなかつた。写真にも撮っているが、平三伯父を中心にドイツ風の平三邸が目立つ。後年観光がてら訪れた時も建物は健在で、中国の軍人などの幹部宿舎になっていた。

さて、話は変わるが、第一次世界大戦後のパリ講和条約で、ドイツの山東省権益が中国に返還されずに日本に譲渡されることが決まつたため、これに激怒した北京大学などの学生が同日講和反対を叫び、運動は全国に波及し中国共産党創設への先駆けとなつた。中国を半植民地化していた帝国主義列強や各地の

軍閥や中国の社会制度、文化にも向けられ、清華大学附属中学から毛沢東の「造反有理」となつてこれが紅衛兵運動の原点となつた。

私達青島に深い絆をもつ人達が観光で訪れたとき案内してくれた紅衛兵のうら若い中国人女性が特に私達夫婦に近寄つてきて、日本は良い国だ、是非一度行つて住んでみたいと日本語で話しかけられた。私達が帰国後彼女が手紙を寄越して、私に保証人になつてくれと頼んできた。

私もできればそうしてあげたいとも考えて、東京都麻布地区にある各国大使館の中の中国大使館を訪ねた。すると待ち合せの控え室は天井も四方の壁も全面総て鏡張りで吃驚してしまつた。やがて、年配の中国人女性が現れて、何のご用かと尋ねるので、かくかくしかじかで、中国現地の女性が私に身元保証人になつてほしいといつている旨話し相談すると、優れた頭脳を海外に出すことは国是から申しても反対。保証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の世の中にいつどんなことが起るか分かるものではない。困難なことです、といわれ目的は達せられなかつた。青島にいる彼女には手紙で丁寧に書いて差上げた。

最近、彼女からの達筆な長文の手紙が見付かつた。

1981年9月3日晚10時 施国香
中国山東昌灘師範専卒とある

さて全く別の話になるが、海経の先輩で36期の学年指導官でもあつた田谷朗(旧姓牛尾)氏とは私が戦後妻と婚約時代に東京秋葉原でお目にかかつたことがあり、公私ともお世話になつたが、話をしているうちに、氏が中国の青島に駐在の体験があることを委しく聞いたので、東京の高級料亭で御馳走を差上げ、杯を重ねて楽しんでることを思い出す。

満鉄の調査部員達は、果てしなき満蒙の広野に住む部族を訪ねて、その名もなき民の心根を揉みほぐし穏やかななかに生活の真実を紡ぎだそうと務めたのであつた。

龐大なその調査資料は西欧、米国等先進諸国の眼にとまり、非常にレベルの高い調査資料であると絶賛された。これらの詳細は、日本の国会図書館の資料室のでも知ることが出来る。